



马天水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不光是个人经历复杂，内心深处也十分复杂，也走过了一条十分复杂的道路。他曾经是共产党内很有才干和发展前途的干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屡受重用，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投靠“四人帮”，犯下严重罪行。从他的人生浮沉中，我们会得到许多有益的镜鉴。

上海党羽人生浮沉录

之一

马天水

■霞飞

早年投身革命

马天水原名马登年，原籍并不是上海市，而是在河北省唐县农村。唐县地处冀中，属于华北大平原，土地肥沃，历来是中国的重要产粮地区，当地农民如无大灾之年，仍可维持基本生活。马家世代务农，由于勤劳节俭，日子还过得去。1911年，马天水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他小时候也帮助父亲干农活，由于劳动的磨练，马天水从小就有一副好身板。他的父亲颇有正义感和爱国心，这一点对马天水是有一定影响的。马天水的父亲有感于农民没有文化会受欺负，加上家里有一点经济力量，就把从小就十分聪明的马天水送到学校读书。

马天水进学校读书时，中国已经兴办新式教育。因此，马天水一开始读的就是新式学校。他从小学读到中学，不仅有了文化基础，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他在学校里读了一些进步书刊，接触到了进步学生，思想便倾向于革命了。

1931年12月，有感于日寇侵占东北并进一步向关内扩张，中华民族危机四伏，20岁的马天水参加了共产党。由于工作积极，表现出色，他受到了党组织的重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马天水也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去。他当过当地游击队领导人，曾率领我抗日武

装伏击日军，炸鬼子的炮楼，曾深入乡村，发动群众，扩大武装。总之，他在抗日战争中不管从事哪一项工作，都干得很出色。他也受到党组织的信任，曾经担任过我党领导的唐县县政府财政科科长，唐县三区区长，中共山西省繁峙县委书记，冀晋五分区地委书记。1949年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马天水受组织委派，南下任中共皖南地委副书记。

马天水投身革命后，受到革命队伍中优良作风的影响，有一些好的品格。例如，他干工作有一种拼命精神，为了解决好某个问题，他有时到了茶饭不进的境地。他做事认真，对于某些人不愿意记的数字，他都下功夫去记。他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到工作第一线，现场解决问题。他个人生活十分朴素，平日总是穿旧衣服，脚穿布鞋。他穿的衬衣有的还是打着补丁的。他有一套新一点的中山装，只是在接见外宾或者到北京参加重要会议时才穿上。他不讲究吃，到下边检查工作，从不在被检查单位吃饭，而是回到市委机关食堂和机关干部一起吃饭。他的这些好的方面，使他很受组织重用，提拔很快。

抓工业的一把好手

1949年上海解放时，马天水已经在中共中央华东局从事领导工业方面的工作了。后来，成立了华东军政委员会，他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负责

人。华东军政委员会领导上海市，而上海市又是华东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因此，那时，马天水把主要精力放在抓上海的工业生产之上。1952年1月，组织上任命他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现在的上海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主管上海工业，他抓上海工业方面的工作，就更直接了。可以说，马天水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从事工业工作的。

马天水抓工业，也确实是一把好手。本来，他也不懂工业方面的事情，但他爱学习，肯动脑筋，平时总是手拿一本工业生产管理或者技术方面的书在读。不懂就去请教专家，很快就掌握了工业生产方面的知识。“文化大革命”前，在上海市里，不论是什么人提到哪一方面的工业生产知识，都难不倒他，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并且自己独特的见解，不光是上海市委的干部们对马天水十分佩服，连上海许多工厂的专家，都对他很是佩服。因此，那时上海的工厂、企业，最怕马天水下去检查。只要马天水来检查，准能查出某些方面的问题来，并且运用自己学到的工



业生产方面的知识，指出产生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有的工厂、企业领导人在工业知识方面，也比马天水逊色不少，马天水提出一些工业生产方面的知识性问题，他们往往答不上来。有的工厂领导人说假话，报假成绩，也瞒不过马天水。由于马天水有这方面的才干，陈毅夸奖过他，陈云也夸奖过他，后来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对他更是十分器重，一次，柯庆施当着上海市委许多干部的面说过：“谁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马天水就是外行领导内行的好典型。”上海市工业方面的事情，柯庆施就交给马天水全面管了。柯庆施还带头称年纪并不比他大的马天水为“马老”，这种尊称，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中。

马天水抓工业，有一种风格，就是经常下去亲自搞调查研究。在上海市的几千家工厂里，马天水至少去过一千多家工厂搞调查。他下去调查，并不事先通知工厂方面，而是自己带一个秘书，直接到工厂去，并且直接和工人谈心，了解情况。许多上海老工人、老的管理干部，至今还记得马天水直接找他们谈话的情形。这种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的风格，使他受益不少。在“文化大革命”前，马天水在上海市委谈起工厂情况来，哪一个工厂有多少人，有多少设备，生产情况怎么样，产品质量如何，甚至哪个车间主任叫什么名字，工厂经营方面的许多详细数字等等，他都能一口道来。在一次讨论工业生产问题的市委常委会上，为人十分尖刻的张春桥想要难为马天水，让他难堪，便故意提问上海市许多不同行业生产不同产品的工厂里的经营数字，问马天水不知道？马天水则毫不含糊，一一作了回答。事后，张春桥让秘书去了解这些数字，发现马天水说的分毫不差。这一点，让一向阴险、待人刻薄的张春桥，也不能不对马天水刮目相看。后来张春桥极力拉拢马天水，也与此有一定关系。

马天水主管工业，还善于从国家政治大局考虑问题。有一件事情能说明这一点。1956年我国进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曾经在当年的1月4日至9日在杭州召开一次有各地主管工商业工作的高级干部参加的讨论会。那时，各地领导干部都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问题心中无数，也提不出更多的意见来。可参加这次会议的马天水却不然，他在会上作了一次重要发言，提出：在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家，是两头小，中间大，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分别占20%、60%、20%。要抓先进的，带中间的，促进落后的。马天水一席话，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他的话曾经作为中央内参的重要文章在中央高层传阅，毛泽东、刘少奇、薄一波，都对马天水的见解十分赞赏。马天水能在发言中提出这样的见解来，自然与他对上海工商企业的情况了解较多有关。

1963年，中国工业战线掀起学大庆的热潮。马天水一开始对大庆经验很不理解。上海市委组织了一个赴大庆参观学习代表团，马天水任团长。他到大庆后，看得很仔细，问得也很仔细。这次实地考察，使他对大庆经验信服了。回上海后，马天水在上海的工厂企业积极推行大庆经验。他特别对大庆的“三老四严”十分信服，要求上海各工业企业必须学习大庆这个经验，“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工作中一定要“严格、严密、严肃、严谨”。

在马天水主管上海工业期间，上海工业生产情况一直很好。当时，上海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占很大比例，上海的工业产品在全国数一数二，至今人们还记得当年上海生产的许多名牌产品。由于上海的工业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比例很大，国家制定计划时，总是首先借重于上海方面的情况，因此，上海生产经营情况不能下降。国家对主管上海工业生产的马天水也十分重视，中央开一些重要会议，是要请他参加的。不光如此，上海的工业生产管理，在当时也是一流的。当然，这肯定不是马天水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上海市



马天水

广大工人、干部共同的成果，但马天水作为主管上海工业的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对上海工业的发展，付出了心血，作出了贡献，这一点也不必讳言。

曾经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马天水作为上海市委领导人之一，曾受到批判和冲击。他对“文化大革命”也曾十分不理解。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那段时间里，他多次对上海市工业部门的干部讲，搞“文化大革命”，不能搞得乱七八糟，不能影响企业生产。工人应该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能让工人出厂去串连，生产要照常进行，生产任务指标必须完成。他要求上海工业战线的领导同志要坚守岗位，坚持党委领导，不能制造反派夺权。

马天水作为上海市委领导工业工作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又持这种态度，自然最先受到上海工厂企业造反派的“炮轰”。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业企业造反组织“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简称），就曾“炮轰”过马天水。而马天水却也偏偏不服气，与“工总司”对着干。1966年11月的一天，正在筹备成立“工总司”组织的王洪文听说马天水到上海交通大学去视察了，就带几个“小兄弟”去那里找到马天水，要求马天水立即在他们拟定的成立“工总司”的文告上签字，承认这个组织。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那种形势下，马天水不便于当面拒绝，就打起了哈哈，拖着官腔说：这个嘛，要研究研究，不要忙于签字。王洪文见马天水不签字，急了，拍着桌子“命令”马天水立即签字，承认“工总司”。马天水不吃王洪文这一套，把脸拉下来，也站起来拍着桌子，大声嚷道：这个字我就是不签，谁知道你们是什么人？要建立什么组织？工厂企业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能成立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是中央的精神，你们违背中央精神，建立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想干什么？马天水这样一发火，还真的把造反派头目王洪文给镇住了，马天水又搬出中央精神来应对，王洪文也对他无可奈何。

听说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到上海一些工厂企业去串连，马天水不高兴了。他对上海市工业企业提出要求：不



要接待北京的红卫兵代表。北京来上海串连的红卫兵听到马天水有这个意见后，专门到上海市委大楼前，高呼揪出马天水的口号，要求马天水“滚出来”，回答“革命小将”的问题，马天水则不理睬他们。

1966年11月下旬，马天水到北京出席工交系统“文化大革命”座谈会。他是带着一肚子气去开会的。会上，就工交系统“文化大革命”问题，发生了争论，有的人高唱“左”腔，提出全国工交系统要大搞大批判，可以成立跨行业跨地区的工人造反组织。马天水在会上坚决反对这个主张。他在会上多次发言，列举了上海工厂企业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混乱情况，对北京的红卫兵到上海各工厂去串连十分反感，对上海成立的“工总司”提出了反对意见，对“文化大革命”也提出了质疑。他的意见，受到了一些主张大乱的人的批判。马天水不服，为了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他在北京专门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办公厅的杨慧洁，要求他们派人到上海的工厂企业去调查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特别是调查“工总司”成立之后，上海生产遭到破坏的情况。马天水则在北京的会议上继续与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人辩论。辩论中又涉及到造反派组织的行动是否“过火”的问题，马天水认为不止是“过火”的问题，造反派组织简直就是动乱之根源。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在上海市委办公厅还没有把他前次要求搞的材料拿出来时，他又一次打电话给杨慧洁，要求市委办公厅下去调查，收集“造反派组织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材料，特别是要再搞出一份关于“工总司”打砸抢的材料，对他们打人、绑人、私设公堂的细节，要写得更细一些。上海市委办公厅按照马天水的要求，给他搞出了材料，很快就传给在北京开会的马天水。马天水手中有了一些材料，气更粗了，胆子更大了。他在北京的会上，理直气壮地指责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人，批判“工总司”组织，认为这是一些坏人搞的组织，专门破坏生产。

张春桥“拉”了马天水一把

接着这个座谈会，中央又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马天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直接批评张春桥，认为张春桥

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起好作用。马天水在全国工交系统“文化大革命”座谈会上的发言，以及随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受到了广泛注意。他的发言，对各省、市、自治区来参加这个会的领导干部影响很大，很多人在会上赞成他的观点。中央高层也对他的发言十分重视，他的发言记录被整理成纪要，传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看后，对马天水十分不满，认为他是“走资派”代表人物，江青把这份材料批给了林彪。林彪看后，对马天水也十分不满，斥责马天水糊涂，说他反对“文化大革命”。林彪的话传到了马天水的耳朵里，马天水吓坏了，当年林彪是副统帅，其党内地位仅仅在毛泽东之下，他的这样一句话，足以要了马天水的命。

马天水吓得一晚上没有睡觉，想来想去，没有主意，就跑到钓鱼台中央文革办公地点，找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攻击过的张春桥讨主意。张春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与马天水同在上海市委担任领导职务。二人同是市委常委，马天水当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时，张春桥仅仅是常委。后来，张春桥也当上了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二人职务差不多。因为分管的是不同领域，除了开常委会，二人没有太多的交往。此时的张春桥，已经是中央文革副组长，是中央“大员”了，地位自然不一般，而且，马天水清楚，张春桥是江青信任的，毛泽东也十分赏识他，他对中央上层特别是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打算，一定最了解，也能在上面说上话。虽然他知道自己和张春桥的观点不同，自己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攻击过张春桥，但此时马天水为了保自己，摆脱被动局面，还是硬着头皮找到张春桥，摸一摸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终目的，也请他给出一出主意。

张春桥早就听说马天水在座谈会上“放炮”的事情了，也看了马天水发言记录整理的简报稿，他自然也对马天水的发言十分不满。但张春桥却与别人想的不同，他有着长远的谋划，在打马天水的样子。此时，马天水自己送上门来，他自然一阵高兴。

马天水一见张春桥，就向张春桥检讨，说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攻击你，是错了，请春桥同志谅解。张春桥很大度地一摆手，就把马天水引到密

室，向马天水交了底——这次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倒一大批，要改朝换代，你要想不犯错误，就必须坚决拥护“文化大革命”，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听中央文革的话。你要是站到反对“文化大革命”方面去，站到刘少奇司令部方面去，你就完了。张春桥几句话点破了马天水的“迷津”，他立即“醒悟”了，当即向岁数比自己小得多的张春桥表示：今后我一定听你的，你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随后，张春桥向江青做了工作，说马天水的发言，是一时糊涂，现在“醒悟”了，要“继续革命”。还要江青给叶群打电话，说明这一情况，做林彪的工作。经过张春桥做工作，林彪、江青都不再提马天水在座谈会上发言的事情了，马天水躲过了一劫。对此，马天水不但从心里感激张春桥，而且下决心，从此以后，紧跟张春桥。

与陈丕显、曹荻秋划清界限

就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交系统“文化大革命”座谈会时，上海已经闹翻了天，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制造了“安亭事件”，此后，便与努力维护生产和工作秩序的上海市委对着干，要打倒陈丕显和曹荻秋，彻底搞垮上海市委，由造反派们掌权。张春桥等人想借机打倒上海市委，由他来掌握上海的大权。在北京开完会回到上海的马天水，态度大变，他不再抨击造反派了，转而表态支持造反派。还表示，自己要“引火烧身”，转变立场。但马天水过去曾经和“工总司”对着干，造反派们一时还不相信他的转变，还是要把他和陈丕显、曹荻秋列在一个“线”上，当作攻击的对象。

1967年1月，发生了“一月夺权”，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后来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于1967年2月24日开了成立大会）。陈丕显、曹荻秋被打倒，几乎每天被揪斗。马天水也被同时揪斗，但此时由于张春桥的“保护”，马天水没有吃太大的苦头，只是处在陪斗的位置。1967年的一天，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等人被“工总司”一个造反派头目耿金章押送到一处秘密地点关押，马天水竟然向造反派表示：你们可以揪斗我、关押我，但我不和陈丕显、曹荻秋坐一个车，也不要把



我和他们关在一个屋子里，因为我和他们不是同一类人。他们是“走资派”，我虽然有错误，但我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

此后，马天水多次写交待材料，除了检查自己过去思想糊涂，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反对过造反派，“犯了严重错误”外，还在材料中揭发了旧上海市委的问题，特别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同时还揭发了陈丕显、曹荻秋“罪行”，他表示：自己要当“无产阶级革命派”，与陈、曹二人划清界限。

靠紧张春桥

自从上海市建立“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当上了“上海人民公社”“一把手”之后，马天水已经意识到，上海是张春桥的天下了。他更是下决心，紧靠张春桥，唯张春桥之命是从，他认为，只有如此，才能确保自己不被打倒，而且还能够飞黄腾达。打定这个主意之后，马天水被造反派放回来后，就开始主动找张春桥了。本来，马天水和张春桥就都住在康平路书记院，两家距离很近，马天水就总是往张春桥家跑，向张春桥了解中央情况，讨主意，并且向张春桥再次表示：我要听春桥同志的。张春桥也不断地“点拨”马天水，让他在什么场合下怎么样表态。从那之后，马天水说的话和造反派们一样了。

马天水的态度，得到了“工总司”等造反组织的赞赏，张春桥更是对此十分高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张春桥就开始为马天水说话了。1967年2月23日，张春桥在一次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前一天的常委会议上说：“马天水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没有发明创造，人家说什么，他说什么。”张春桥这句话，把马天水和陈丕显、曹荻秋区分开了，实际上是说：马天水只是一个受蒙蔽者，而陈、曹二人则是地道的“走资派”。

2月24日，上海市召开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张春桥在大会上讲话时，也提到了马天水。他说：“上海起来造反的干部中间，还是一般干部比较多。市委书记一个造反的也没有。这首先应该是由陈丕显、曹荻秋负责，他们对干部是欠了债的。据我所知，中央的很多指示在上海没有很好地向干部传达。不

但在座的很多同志，很多一般群众、一般干部没有传达，包括有一些跟随他的干部，甚至市委里的人也没有传达，连市委书记处都没有传达，连马天水都不知道。马天水所以跑到工交会议上放炮，那当然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但是，后来我在北京开完会时，他告诉我说：‘我不知道主席的意见。’所以他敢于跑到中央工作会议上继续攻击我。他确实不知道主席的意见，不然，我想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而且，陈丕显、曹荻秋那些人鼓动他，说你到北京好好地讲，什么话都讲。”张春桥最后为“解放”马天水做了铺垫，他先领着大家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就是毛主席说的看干部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要看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那一段，然后说：“我们刚刚念语录，不是说按主席指示，看干部不但要看一时一事，而且看全部历史吗。那么我们应该看一下这些干部十七年来的表现，可以加以对照。很多干部在柯庆施同志在世的时候，他们是执行的主席的路线，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他们的表现也不完全是相同的。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一个样。我们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

在九大上成为中央候补委员

张春桥当时地位可不一般，他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已经是“中央首长”了。中央文革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政治局常委之下领导全面工作的机关，因此可以说张春桥是实权在握。另外，江青信任他，毛主席信任他。中央让他当上海市的“一把手”，实际上是把上海交给他负责了。张春桥保马天水，是管用的。果然，张春桥讲话不久，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会就研究了马天水的问题，认为他过去是好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时糊涂，说了错话，办了错事，但很快就改正了，和“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划清了界限，已经成为革命干部的代表了。在张春桥主持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会决定，“解放”马天水，让他作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老干部”的代表，参加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张春桥还专门乘飞机到北京向中央文革谈了这一打算，中央文革向毛泽东等作了汇报，这件事就定了下来。张春桥回上海后，先是在市革命委员会高层内部作了传达。

1967年4月，上海市委机关中原来贴出的批马天水的大字报突然被取了下来，上海街头贴的“打倒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的大标语中，马天水的名字被覆盖了，“工总司”的小报上，批判的对象中，也不再有了马天水的名字了。人们正在猜测时，在一次会议报道中，突然发现，马天水作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出现了。而且，此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马天水的名字频繁出现在上海的各大报纸上。人们已经发现，他还是主管上海市的工业生产的副主任，因为他的讲话，都是工业方面的，他视察的单位，都是工厂、企业。

平心而论，马天水当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并主管工业后，还是抓了生产的。他仍然到工厂去检查工作，仍然抓生产指标，仍然搞计划，但此时，他抓生产的路子，已经与“文化大革命”前不同了，他是按“抓革命，促生产”的路子搞的。他每到一个单位，先问的是“革命”的情况，他支持造反派，赞成造反派造反、夺权，然后才问一些生产方面的情况。这显然是矛盾的，但在那种情况下，有人过问一下生产情况，总是比没有人过问要好一些。事实上，在造反、夺权之后，上海的生产虽然确实受到了严重影响，但也没有完全停止下来。而张春桥在掌握了上海领导权后，也想稳定下来，他也支持马天水的工作。他的意图是：此后由马天水抓生产，帮助他管上海经济方面的事情。这样一来，马天水虽然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名字排得不靠前，但他手中的实际权力并不小，因为他主管上海的全部经济工作，主抓生产，重要的经济审批权都归他掌握。上海经济工作这一块，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而上海经济情况在全国则举足轻重。

不仅如此，投靠张春桥之后的马天水，确实飞黄腾达了。1969年4月中央召开九大时，马天水作为九大代表出席了大会，在九大上，他还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这在马天水政治生涯中，是关键的一步。政治上可以说是“过关”了，再也没有人敢打倒他了，他还可以参与中央大政方针的讨论。

张春桥的上海管家

九大之后，马天水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的地位可说是稳固下来了。张春桥、姚文元在九大上当上了中央政治



局委员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北京，回上海的时候少了，就把上海交给他们信得过的人管着。政治方面，有王洪文、徐景贤，而经济方面，他们则依靠马天水。张春桥说过，有马老在，上海经济工作不用操心。确实，凡是经济方面的事情，张春桥都交给马天水管，也只有马天水说话才好使，马天水也老老实实地为张春桥管上海这个老窝，张春桥让他怎么干他就怎么干，他执行张春桥的指示真是到了不折不扣的程度。

自从投靠张春桥后，马天水就竭尽全力维护张春桥。早在1967年底，上海发生炮打张春桥的事件时，马天水就为保张春桥而心中十分焦急。一次，他到复旦大学去，看见那里贴着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赶紧派人把这张大字报取下来，又亲自打电话向张春桥汇报，随后，又亲自动笔给张春桥写汇报材料，光是信纸就写了十几张。此后，他跑到各种会议上为张春桥说好话，对那些炮打张春桥的干部、群众进行威胁利诱，与王洪文的武力保护张春桥的行动相配合，把这股“倒张”风潮打了下去。1968年4月，上海发生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的风潮，主要是揪住张春桥老婆文静历史上叛变问题以及张春桥包庇文静的对张春桥进行攻击，也提到了张春桥历史上的一些疑点。提出这一问题，在当时是分量很重的，对张春桥冲击很大。马天水见此次风潮来势很猛，便亲自出面做工作。他当着上海市许多群众组织头目的面说：我和春桥同志在文革之前就在一起工作，共事的年头很长了，我对他的工作很了解，他是好同志，我对他的家庭和历史也都很清楚，他老婆没有什么问题，他更没有什么问题，我敢担保。当有的群众组织头头质问马天水，为什么你要死保张春桥时，马天水也上来一股牛劲，拍着胸脯说：你们炮打张春桥，我就是不答应，我就是死保张春桥，我就是死了，也要站在张春桥一边！

马天水这个话后来传到张春桥耳朵里，张春桥对马天水更是信任有加，把马天水视为自己的亲信死党。张春桥除了推荐马天水当九大中央候补委员外，还进一步向中央推荐马天水，因此，党的十大上，马天水的地位又上升了，他成为中央委员。

马天水不光紧跟张春桥，还处处

按照张春桥的意图办事。他在十大上还为王洪文说好话。十大上，许多代表，特别是一些老干部，对选王洪文当接班人存有疑问，在讨论时提出不同意见。有的人还提出了王洪文1966年制造“安亭事件”卧轨拦车是不是革命行动的问题，有的人提出王洪文在1967年用武力把另外一个造反组织“联司”镇压下去的问题。正在此时，马天水按照张春桥的意图，在讨论会上为王洪文说话了，他说：我觉得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后进步很大，看问题、讲话，都很深刻，很全面，对我教育很深。他在“文革”初期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是有功的，他卧轨拦车是同“走资派”斗争，他处理“联司”，是同反革命势力斗争，在斗争中表现勇敢、坚决，他是紧跟毛主席的。在同林彪一伙斗争中，他立场坚定，想用生命保主席。我在上海和洪文同志相处多年，觉得他看问题、想问题很全面，有组织能力、领导工作能力，不是一个只会冲冲杀杀的人，这一点我可以起誓，向大家保证。春桥、文元同志长期在中央工作，上海是洪文同志主持工作，我觉得，他比我强得多。

马天水是老干部，他这番话，可以说对十大上许多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是有影响的。他的话，在保王洪文“过关”，使他顺利地当上了中央副主席上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自然，王洪文和张春桥都感激他。

被“四人帮”内定为副总理

1975年，重新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着手整顿。引起了“四人帮”的极大仇视。中央内部围绕整顿和反对整顿的斗争，十分激烈。在此情况下，邓小平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者，曾把目光投在马天水身上。邓小平主要考虑，马天水毕竟是老干部，“文革”中也一直在抓生产，好好和他谈一谈，他是会支持整顿的。

1975年6月，邓小平到上海视察工作，顺便把马天水找来，和他谈了一次话。邓小平对马天水说，上海批唯生产力论，是不对的，这样批下去，会破坏生产。听了邓小平的话，政治上很老练的马天水思忖良久，他在邓小平与“四人帮”之间做了一个权衡，最终，他认定，在中央，还是“四人帮”力量大，在上海，“四人帮”的力量更大，因

此，他把心一横，还是决心跟“四人帮”。于是，他回答邓小平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批唯生产力论批得对，我们上海钢铁五厂，就是批唯生产力论而把生产搞上去的。邓小平没有料到马天水会这样说。“话不投机半句多”，邓小平见此，没有再说话，谈话就此结束。在这次与邓小平谈崩了之后，马天水更加紧跟“四人帮”了，他把自己的政治生命的赌注，全部压在了“四人帮”一边。

马天水把邓小平和他谈话的内容以及自己的表态向张春桥汇报后，张春桥更加信任他了。此时的“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并且私下里拟定了他们上台后的中央领导班子名单。在这个名单中，竟然有马天水，而且是拟定让他当副总理。

可见，“四人帮”对马天水是何等的信任和重视。如果不是后来粉碎“四人帮”，紧跟“四人帮”的马天水，就会平步青云了。

亲自批准突击发枪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逝世，“四人帮”认为时机到了，处心积虑要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甚至考虑到了武力夺权的方案。但是，他们苦于手中没有枪杆子，不好办。为了掌握一部分武装力量，“四人帮”策划在上海搞第二武装。王洪文多次回上海活动，想把上海民兵搞成第二武装，而把上海民兵搞成第二武装的关键，是给民兵发枪。

这时，马天水也积极行动起来。他按照王洪文的意图，亲自批准给上海民兵突击发枪。经他签字批准，给上海民兵突击发了50万件武器，装备10个高炮师、185个高机连、3个地炮师、1个一三〇火箭团、一个水陆坦克师，36个武装基干团、518个武装基干连、4212个基干排。马天水还批准上海一些工厂生产武器。

被中央控制在北京

就在马天水按“四人帮”的旨意，在上海积极活动之时，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在中南海把“四人帮”全部抓了起来。

抓了“四人帮”后，华国锋最注意的就是上海方面。他知道上海是“四人帮”的老窝，他们在那里经营多年，死党很多，如果搞不好，上海会发生叛



乱。从维护全党和全国人民利益和国家稳定大局出发，华国锋决定采取策略，稳住上海。华国锋第一个考虑到需要稳住的人物就是马天水，因为马天水在上海大权在握，是“四人帮”安在上海的管家。

1976年10月7日，即“四人帮”被抓的第二天一大早，华国锋就指示中央办公厅给上海的马天水直接打电话，通知他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于当天中午之前赶到北京来开会。接到电话，马天水立即紧张起来，他在电话中问：去北京开什么会？对方只是重复中央通知，不加任何说明。马天水放下电话后，满心狐疑。他想，中央最近一段时间没有什么会议，为什么要通知我去北京开会呢？他想给张春桥打个电话问问究竟，但考虑到一大早张春桥肯定还在睡觉，不好打扰他，就没有打这个电话。但他总是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因为是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电话，马天水只好草草收拾一下，赶往上海机场。在去机场的路上，他向同车为他送行的徐景贤、王秀珍说，我一到北京，就会打电话告诉你们的。在机场，徐、王二人也一再叮嘱马天水到北京后给上海打回电话报个平安。三人道别后，马天水登上了去北京的飞机。

马天水一到北京，就直接被中办的汽车接去参加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当马天水在这次会上听到“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之后，目瞪口呆，额头上冒出了汗，好一阵才回过神来。讨论时，与会者纷纷表态，拥护中央决定。华国锋不住地用眼睛盯着马天水。华国锋虽然没有说话，但那眼神很明确：你是什么态度？

马天水不能不在会上说几句了。他说：我也拥护中央决定，但是，“四人帮”是否真的要篡党夺权？为什么一定要抓起来隔离审查？建议党中央能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张春桥在“一月风暴”、“大联合”中是有影响的人，中央要慎重对待，即使有错误，也要宽大处理。马天水还提出：他们关在哪里？我能不能去看望他们？

马天水的表态，在华国锋意料之中，但也使华国锋深深担忧：上海方面毕竟是“四人帮”的老巢，如果搞不好，要闹事，对国家和人民不利。于

是，会后，他派苏振华代表中央去和马天水谈话，一来摸上海方面的情况，二来进一步稳住马天水。苏振华和马天水谈话时，马天水情绪很不好。但从这次谈话中，苏振华还是大体了解了上海方面的情况。苏振华要求马天水一定要按中央要求办事，马天水答应了。中央下决心把徐景贤和王秀珍也调到北京来，并且派苏振华为首，组成中央工作组，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时，即由中央工作组接管上海的全部权力。

1976年10月9日，马天水按中央的要求，给徐景贤、王秀珍打电话，传达中央通知，要他们来北京开会。马天水在电话中还说：他们三个（指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身体很好，中央正在筹备一个重要会议，他们工作很忙，让我代他们问你们好。马天水的这个电话，确实对上海的“四人帮”死党起到了麻痹作用。上海方面策划的武装叛乱，暂时放置下来。徐景贤、王秀珍也被调到北京。这样，上海方面的“四人帮”死党群龙无首，再也搞不起武装叛乱来了。

1976年10月13日上午，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同机飞回上海。他们下飞机后就一言不发。他们知道，此时，中央已经派工作组把上海局势控制住了，他们在上海是毫无作为了。当天晚上，由马天水主持，在上海锦江小礼堂召开了市委常委及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会议。马天水首先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接着，自己也作了一点检查。徐景贤传达了毛主席生前批评“四人帮”的话，王秀珍则在讲话中说：听了毛主席的话后，我的认识有所转变。这时，“四人帮”的亲信、市委常委黄涛站起来，指着马天水、徐景贤骂：叛徒！叛徒！陈阿大站起来喊：老子他妈的拼了！在场的许多“四人帮”死党大哭大闹起来。这时，马天水说话了，他说：两条原则：第一，不通也得通；第二，要闹也不准闹。你们听清楚没有？今天每个人都得表态，不然就别想回去。马天水说完后，有几个市委常委表态拥护中央决定，最后“四人帮”的死党都言不由衷地表态拥护中央决定。

鉴于马天水当时的表现，更主要的是为了稳定上海，在那一段时间，马天水仍然作为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露面。10月24日，

上海人民广场召开的拥护华国锋任中央主席，拥护粉碎“四人帮”的有一百多万群众参加的大会，由马天水主持。这次大会给华国锋主席、党中央发去了致敬电。早在上海开群众大会之前，中央就作出了改组上海市委的决定，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振华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10月27日，上海市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宣读了中央的这一决定。在这次会议上，马天水仍然以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发言，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这是马天水作为上海市委领导人的最后一次露面。不久，马天水被隔离审查。

受到了人道主义关怀

1982年，上海司法部门审判“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时，马天水已经疯了，用医学上的术语说，就是患上了“反应性精神病”。鉴于这一情况，上海司法部门决定，对马天水暂时不提起公诉，取保候审。马天水的弟弟马登坡出面作保，把已经疯了的马天水领回原籍养病。

但是，马天水返回老家后，精神病经常复发，发病时，就离家外出，胡言乱语，马登坡也管不了。一年多后，马登坡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解除自己对马天水的担保，由政府负责管束马天水并给他治病。中央考虑了这一情况，也考虑到马天水在战争年代有功，便决定从人道主义出发，由国家把马天水养起来，并为马天水治病。1983年4月，中央有关部门派纪委干部、公安人员、医务人员到河北省唐县马天水老家去接马天水。他们一到马天水住的村子，就看见一个老头一个人在村边走，时而大笑，时而大叫。村里人指认：这就是马天水。工作人员要把马天水带走时，马天水却朝荒郊野外跑去，躲在小树林中，后来又躲在一个小水沟里，工作人员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找到，把他扶上吉普车，离开他的老家。此时的马天水，如果提起抗日战争那一段历史，还能够清醒地说话，一提起“文化大革命”，他就头脑不清楚了，一派胡言乱语。

马天水被接回大城市，得到了组织上的照顾，他的病也得到了医治，但始终没有太大的好转。1988年，马天水病逝，时年77岁。■



上海党羽人生浮沉录

之二

徐景贤

■ 霞 飞

思想倾向进步的青年

徐景贤祖籍是上海市附近的一个小城镇——奉城镇，祖上是读书人，曾有不小的功名。祖父经商，家道富裕。而徐景贤的父亲徐雅平是中共早期的党员，1926年就入党投身革命，并和他的入党介绍人李主一共同创办“曙光中学”。他们利用这所学校作掩护，集中革命青年，发展共产党的组织。

然而，徐雅平并不是一个坚强的、能够经受血与火的考验的共产党人，他后来脱离了共产党，成为一个专心治学的无党派人士。这原因是，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徐雅平通过办中学发展共产党这件事情，也被奉贤县县长得知。国民党于1928年4月，出动军警，查封了“曙光中学”，逮捕了李主一和徐雅平。但是徐雅平和李主一的结果却不同：徐雅平于1928年4月在上海《申报》上发表了“自首申白”，表示从前错了，现在自首，今后不再参与共产党的任何事情。李主一则坚决不发表“自首申白”，他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共产党的信仰，最后被国民党杀害。有意思的是，徐、李二人做不同选择的消息，在一个星期内先后见于《申报》，当时的人都看得很清楚。从这

一点，也可以说，徐景贤出生在一个没有保持住革命气节的家庭。这对于徐景贤后来的道路选择，不能不说，是有一定影响的。

徐景贤的父亲徐雅平因在他办的中学里发展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已经被国民党查封，一家人在奉城镇呆不下去了，于是，他父亲就到上海谋生。他很快就找到了对象——戴秋楠，并于当年结婚。婚后不久，他父亲又通过同学的介绍，到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当教师。从此，他专心致志搞学问，时间一长，倒也成为上海交通大学数一数二的教师，收入颇丰，家庭生活也算是旧上海一流的。徐景贤是他父母结婚第五年才出生的。这一年是1933年。他出生时，家庭已经安定下来，又是上海生活条件较好的家庭，因此，徐景贤不像劳动人民家庭出生的孩子那样从小受苦，而是从小就生活在条件优越的家庭。徐景贤很聪明，上小学后，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老师经常夸奖他，还把他树为全班的榜样。

徐景贤的父亲虽然脱离了共产党，远离政治，一心一意搞学问，但在思想倾向上，与国民党格格不入，总体上还算是同情共产党的。这对于徐景贤是有影响的。徐景贤从小就读了一些进步书

徐景贤在“文化大革命”前曾是上海市委重点培养的干部，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反戈一击，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从此受到“四人帮”信任。当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之后，把他们的老窝——上海，交给了徐景贤掌管。曾几何时，“四人帮”被粉碎，徐景贤也因参与“四人帮”的一些阴谋活动而被隔离审查，最终被判刑。徐景贤何以从受到信任和培养的干部而成为人民的罪人呢？



刊，也受到了一些进步思想的薰染。上小学时，他仅仅是读了家里面藏的一些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上中学时，情况不一样了，中学里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经常组织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思想倾向进步的徐景贤自然就参加到学生运动中来。游行、写标语、发传单，等等，他都抢在前面。

但他父亲却鉴于自己的“教训”，不希望徐景贤从事政治活动，多次劝他，不要再参加学生运动了，这样做“危险”。但是，徐景贤不听，仍然照样参加。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人民解放军大军开进到长江以北，准备渡江解放中国南方时，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市民运动空前活跃，徐景贤参加进步学生运动的次数就更多了，由于他表现积极，中学里的共青团组织就想发展他入团。他父亲得知后，坚决不同意他加入共青团。为这件事情，他们父子二人还大吵了一顿。他父亲不仅没有阻止了徐景贤入团，也没有阻止了他



入党。在上海解放前夕，徐景贤加入了共产党。

华东局的笔杆子

新中国建立后，徐景贤正好中学毕业。当时，共产党刚刚解放南方地区，需要大批干部参加新政权的建设和领导工作。一开始，他是在上海市的区里工作，后来，中共中央华东局迁入上海，急需一批干部，徐景贤就被调到华东局的宣传处工作。当时的徐景贤，工作是积极的。华东局宣传处的许多重要文件，都是他在处长指导下起草的。宣传处长是老干部，也有一定文化，也能写，但他很器重徐景贤，许多文件就交给徐景贤起草。那时，会议多，文件多，起草文件往往不分昼夜，有时一连几天几夜连轴转。徐景贤年轻，身体好，笔头也快，因此，大部分材料的起草工作，就落在了他的头上。而徐景贤恰恰有这样的特点——领会领导意图快，文字功夫好，因此，他起草的材料，是很受华东局领导人赞赏的。一来二去，不光是宣传处的材料要他起草，连华东局的一些重要文件也要他起草。时间一长，徐景贤就以华东局的“笔杆子”而小有名气了。当时，徐景贤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他虽然出身于富裕人家，但并无骄奢之气，平时，就穿着一身列宁装（后来经常穿的是中山装），衣服上边的口袋里插着两枝钢笔。一双布鞋，要穿许多年，破了也要修补一下再穿。机关里有什么搞卫生、到其他地方劳动的事情，他也走在最前边，干得也最起劲。他为人



徐景贤

比较谦和，见到和自己同级或者下级的干部，也总是主动打招呼。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业余爱好，他的爱好就是读书。平时，机关里的干部总是见到他手里拿着一本书，有空就读起来。他起草文件多，与领导人接触也就多了起来，但他在领导干部面前，也并不低三下四，毕恭毕敬，而是自然相处，这样反而使领导干部们更喜欢他了。

但他在华东局最突出的，还是笔头快，文字功夫强。这对他帮助极大。由于有这个特长，他在华东局是很受重视的。一般中层领导干部不能参加的会议，也让他列席，有什么重要政治信息，华东局领导也要向他讲一些，有些重要文件的内容，也要让他知道。目的是为了使他起草文件有个主旨。

徐景贤不光是起草文件是把好手，在业余时间还经常写一些文学作品。其中，杂文、文学评论、小品文等居多。他一般不用笔名，因此，在当年上海的一些报刊上，经常能够看到徐景贤的文章。这使他在华东局得分不少。因为在那个时代，在中央、毛泽东等领导人是写作高手，对擅长写作的干部，是很重视的。上行下效，在中央局、各省委、各地委，乃至各县委，领导人都十分重视能写作的人。华东局领导人就对徐景贤十分重视。他的文章见之于报刊，领导人也总是要看一看的，这对徐景贤进一步树立自己“笔杆子”的形象，是十分有利的。

然而，徐景贤虽然笔杆子厉害，但在职务提升上却并非一帆风顺，这缘于他的家庭背景——当年他父亲徐雅平脱离共产党时被上海《申报》发表的“自首申白”成了徐景贤家庭出身方面的污点。一段时间，徐景贤心灰意冷。他自己觉得，在政治上已经没有前途了，就想另外寻找发展途径。于是想在文学创作方面发展，立志做一名作家。

为了向文学创作方向发展，成为一名作家，徐景贤总是想方设法接触一些住在上海或者在上海担任一定职务的著名作家。他经常去见著名作家夏衍，把他的作品给夏衍看，请夏衍指导。一来二去，他和夏衍的秘书葛蕴芳便熟悉了，

二人谈起了恋爱，最后，葛蕴芳成了他的妻子。

平心而论，徐景贤在文学创作方面还是很有天赋的，他的文学创作水平，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有了很大提高，他写的文学作品也呈现出老练的风格。他后来参与话剧《年青的一代》的改编和创作，该作品获得文化部优秀话剧奖，以及他后来出版过《生命似火》一书，就是证明。今天，我们从徐景贤当年的作品中，仍然能够看到他文笔的优美，描写人物内心世界之深刻。如果不是因为张春桥，徐景贤很可能真的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并成为今天仍然很有名气的作家的。

被张春桥看中

1957年，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斗争在全国展开。徐景贤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与别人相比，徐景贤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经常在领导人身边工作，对上边的精神了解得比较多。他能从领导人的谈话中，了解领导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他也有条件站在领导人的角度看待一些事情，因此，在反右斗争之前的“鸣放”阶段，徐景贤不但没有任何“鸣放言论”，相反，他倒是从下面报上来的内部材料中，看到一些人的“鸣放言论”以及领导人对这些言论的看法。因此，在这场斗争中，徐景贤一开始就站在“左派立场”上了。1957年下半年，全国开始反右斗争，上海的《解放日报》上陆续发表了一些反右斗争的文章，其中，就有徐景贤写的。与当年《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姚文元的反右斗争文章相比，徐景贤的文章少得多，影响自然也没有姚文元的文章大，但是，徐景贤的文章另有风格，他的文章尖锐、深刻、泼辣、生动，并不硬性上纲，而是旁征博引，风趣幽默，引人爱读，因此，当年徐景贤的文章也吸引了上海一大批读者。在这些读者中，张春桥就是一个。

张春桥在上海时，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一大早就看《解放日报》，而且看得很仔细。在反右斗争中，作为“左派”人物的张春桥，自然对反右斗争的文章更加注意。徐景贤的文章，每发表之后，他都要读。张春桥对徐景贤的观



点和文笔，都很赏识。张春桥过去就认识徐景贤，但接触不多。现在以反右文章为线，把二人连了起来。

有一天，张春桥主动打电话邀请徐景贤到他办公室去谈谈。张春桥在问了徐景贤一些情况后，当面夸奖徐景贤的文章写得好。张春桥还向徐景贤谈了目前全国政治形势和他的看法。他鼓励徐景贤继续沿着写政治评论文章的路子走下去。这次谈话，徐景贤给张春桥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不久，张春桥向柯庆施推荐了徐景贤，柯庆施过去也看过徐景贤的文章，张春桥推荐之后，柯庆施也找徐景贤谈了一次话。谈话中，柯庆施问了徐景贤对当前政治形势的看法，徐景贤的答复令柯庆施满意。这次谈话不久，徐景贤就被调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行政级别也被提了上来。和同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人相比，自己不再感到低人一等了。

徐景贤感到自己在政治上也有了盼头，跟紧柯庆施和张春桥这两个上海市的大人物，自己的前途是光明的。从此以后，徐景贤热心于吃“政治饭”了。他虽然仍然热爱文学创作，但他把更大的精力和更多的时间花在了研究当前政治动向上，花在了研究阅读《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在市委写作班子里，他经常在柯庆施、张春桥身边，因此，也能够从柯庆施那里，得知中央的一些情况。他也用了很大精力去研究柯庆施每句话甚至玩笑话中的政治含义，在脑子里反复琢磨，得出结论，然后在写作文件时，把有关政治理念揉进去。

本来，徐景贤自己的思想就够“左”的，调到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后，由于紧跟柯庆施、张春桥，徐景贤的思想更加“左”了。那时，他在有关全国重大政治问题的看法上，与柯、张二人是一致的，因此，他起草文件稿，总是能够和柯、张二人的思想合拍，也就受到了柯、张二人的赏识。不久，徐景贤就被进一步提拔为市委写作班子的党支部书记，同时主抓“丁学雷”写作小组。这个支部书记的职务虽然不起眼，但地位不一般。因为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是分为几个组的，每个组的头头，都是响当当的

“大笔杆子”，而且级别不低。这个写作班子，还分别用一些笔名，在全国报刊上发表一些有重大政治影响的文章，例如，有“罗思鼎”、“丁学雷”等等。当年，一提起用这些笔名发表的文章，一提起写作小组写的重要文件，老上海市委的许多干部仍是记忆犹新的。徐景贤是这些写作组的总管，他经常召集各写作组长开会，研究形势，研究写作的文章的问题。市委写作班子的全体大会，也由他召集。他实际上就是代表市委领导人来管理这个写作班子的。

差一点被误认为“保皇派”

柯庆施于1965年4月去世后，徐景贤在上海市委仍然吃香。他仍然是市委写作班子的党支部书记，仍然受到重用，参与上海市委重要文件和重要文章的起草和写作工作。这原因，不仅是因为张春桥仍然是上海市委领导人，而且因为上海市委其他领导人对他也十分赏识。当时上海市委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都对徐景贤十分信任，他们的一些讲话稿，他们主持搞一些重要文件，都要找徐景贤起草。徐景贤已经有了“上海市委第一号大秘书”的称号了。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上海市也陷入了动荡之中。不久，一件一件的大事发生了，一些工厂里出现了给党委贴的大字报，一些学校也成立了群众造反组织，北京的红卫兵也来上海市冲击市委机关了，特别是这一年，发生了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所制造的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不久又发生了围攻《解放日报》等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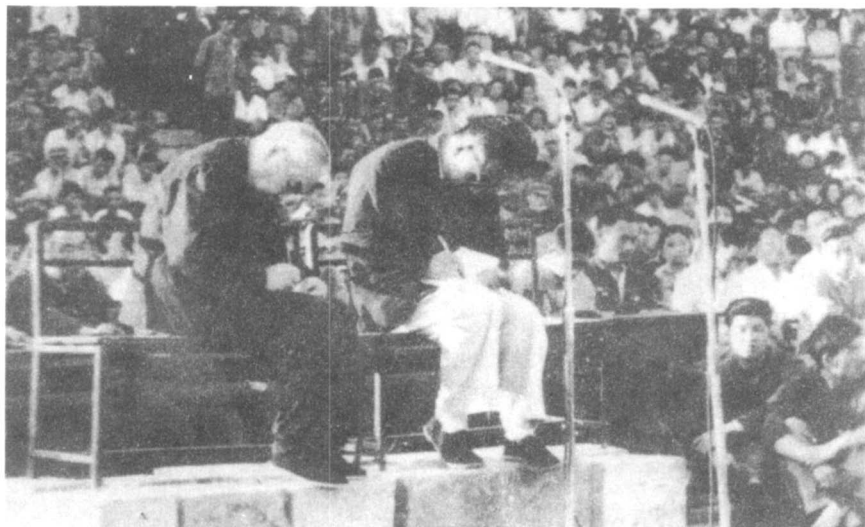
面对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徐景贤也有了热血冲动之欲望，思想上一贯“左”的他，是拥护和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但是，他也有另一面，由于他和市委领导朝夕相处，也受到一些市委领导的影响，一开始，他对于“砸烂”、“造反”、直接冲击市委机关、破除“四旧”、成立跨行业、跨地区的造反组织这些事情，是不赞成的。正是由于徐景贤有这两方面特点，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是受到各方面重视的人。主张造反的人认为他思想进步，是“革命派”，老干部们也认为他比较稳当。因

此，在上海市委成立文革小组时，他被选定为这个小组的成员。

作为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徐景贤一开始还是比较稳重的。当发生“安亭事件”时，他为之震惊。他是反对卧轨拦车的。在上海市委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受到冲击、批斗时，一开始，他对陈、曹二人是同情的。作为市委“第一号大秘书”，他经常为陈、曹二人写检讨书。在陈、曹二人被揪斗时，他随护在陈、曹左右，有人推搡陈、曹，他也上前拦阻，陈、曹心情不好时，他总是去安慰陈、曹，陈、曹二人坚持稳定局势，维护上海市的正常工作秩序，徐景贤是坚决拥护者之一。那段时间，他作为上海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紧跟在陈、曹二人左右，把他们的指示尽快的传下去，或者写成文件发下去。他按陈、曹二人指示，经常和各系统、大单位通电话，了解情况，下达稳定局势的指示。这样一来，在上海市委机关，许多人都认为徐景贤是“保皇派”，是陈丕显、曹荻秋的人。实际上，这是误解。徐景贤从思想根子上，是和张春桥一致的，他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他也是赞成一些“造反”行动的，只不过他当时还认为，“造反”行动要有一定限度。他也是要造反的，但他一时对形势看不太清楚，他迟迟没有行动，是因为他要用一段时间观望形势。

由于徐景贤一度被误认为是“保皇派”，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也险些受到冲击。那时，上海一些高校的红卫兵认为，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没有起好作用，他们发表的文章，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是反动的。于是，就纠集一些人跑到上海市委来，要揪出“丁学雷”、“罗思鼎”，要打倒“黑秀才”。

徐景贤是个机灵人，在政治上，头脑相当敏锐。他早就注意到上海一些高校中红卫兵的传单上批判“丁学雷”、“罗思鼎”了，在心惊肉跳之余，他也提高了警惕，他预感到会有红卫兵来市委机关揪“黑秀才”。所以每天上班都稍晚一些，经常在办公楼附近转，观察动静。果然时间不长，同是市委写作班子的历史组（也是“罗思鼎”组）负责人朱永



陈丕显（右）和曹荻秋（左）在一次批斗会上。

嘉，被红卫兵架走，遭到批斗。

朱永嘉被揪斗这件事情，使徐景贤吓破了胆。他认为，红卫兵下一个揪斗的，肯定是自己，因为在市委写作班子里面，他的地位要高于朱永嘉。

徐景贤一连几天没有睡好觉。他思来想去，认为自己光是这样躲避，总不是个办法，必须来一个根本解决。那么，什么是根本解决之策呢？他想来想去，认定：自己也必须和市委领导人划清界限，紧跟“文化大革命”的形势，靠上已经是中央文革成员的张春桥、姚文元，才能彻底摆脱目前的被动局面。

反戈一击

徐景贤打定主意后，就利用自己在市委写作班子工作，知道张春桥、姚文元在北京钓鱼台办公室的电话的有利条件，悄悄地给张春桥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张春桥是个多疑的人，接到徐景贤的电话后，并不答复，只是听着徐景贤讲，并不说话。因为张春桥考虑到了徐景贤打电话的用意，脑子里立即想到是否来试探的问题，甚至考虑到了电话那边是否有录音机的问题。徐景贤见张春桥不说话，心中没有了底，他失望至极，心灰意冷，做好了准备被揪斗的思想准备。

不料，正在徐景贤六神无主之际，张春桥的老婆文静来找他了。文静向他传达了张春桥的意见：要尽快和旧市委划清界限，起来造旧市委的反，造陈丕显和曹荻秋的反。在朱永嘉被揪斗这件事

情上，由于徐景贤曾经让自己手下人向姚文元求救，姚文元也主动通过这条线来和徐景贤联系了。姚文元在钓鱼台那边把电话直接打到了徐景贤的家里，向徐景贤讲了全国的形势和发展趋势，明确提出，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应该向旧市委开火，要反戈一击，你徐景贤是头头，要带领写作班子这班人马，脱离旧市委，要在“文化大革命”中立头功。

1966年12月12日下午，已经进入冬季的上海刮起了小风，在动荡中无所事事的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干部们大多穿上外套，准备回家了。突然，徐景贤通知，立即到会议室集合，要开紧急会议。大家只好集中到会议室。会议开始，徐景贤一脸严肃。他用两眼把在场的人都打量了一番，然后才慢慢开口道：“文化大革命”已经起来了，我们到底做什么样的选择？这个严峻的问题已经摆到了我们面前。接着，他通报了朱永嘉被复旦大学红卫兵揪斗的情况，通报了姚文元电话中讲的话，还把张春桥的意思，向大家讲清楚了。最后，他要大家表态，我们到底做什么样的选择？是起来造反，还是被动地当“保皇派”？市委写作班子的秀才们立即就明白了。在当时政治形势下，与会者纷纷表态：要造反，不再做旧市委的奴隶，要紧跟毛主席，紧跟中央文革。徐景贤见火候足了，立即向大家提出自己的方案：要杀旧市委一个回马枪，要利用我们手中掌握的材料，揭陈丕显、曹荻秋的老底。

大家拥护徐景贤的这个意见，于是，他们接着研究具体方案。

市委写作班子这帮秀才们，决定马上做四件事情：第一件：宣布造反，揭发旧市委，特别是要集中火力向陈丕显、曹荻秋开火。第二件：立即成立造反组织；大家推举徐景贤、郭仁杰（市委写作班子的党支部副书记）当这个组织的头头，办一个小报，叫《机关炮》。第三件：要和市委机关其他造反组织联合。说干就干，第二天，徐景贤就和市委办的《支部生活》造反组织的头头王承龙联系，二人一拍即合，决定联合起来，搞一个造反组织，名字叫“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市革联”），徐景贤当这个组织的“一把手”，王承龙、郭仁杰是领导成员。第四件：把上海市委中，特别是陈丕显、曹荻秋的核心材料抛出来，与市委外面的造反组织来一个里应外合，打倒市委。

于是，第二天，也就是12月13日上午，上海市委机关里，出现了重量级的大字报，即揭发上海市委镇压“文化大革命”的“核心机密”的大字报，下面署名“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时，一个叫《机关炮》的小报在市委机关广泛散发，上面刊登了“秀才”们揭发市委领导干部“严重错误”的文章，小报的创办者，同样也是“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大字报和小报上的文章，主要出自徐景贤之手，其他文章也经过了修改和充实。

大字报和小报一面世，立即产生了影响。陈丕显、曹荻秋等老干部愤怒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一直十分信任，不久前还在帮助自己写检讨材料的人，会在背后给他们一刀。特别是还把上海市委一些机要文件抖落出来。对这件事，陈丕显一直到晚年也念念不忘，回忆起来感慨良多。一些拥护市委的干部也震惊了，他们也没有想到，这些人会在陈丕显、曹荻秋岌岌可危之时，杀他们一个回马枪。北京驻上海的一些红卫兵联络站来找徐景贤了，提出了联合行动的要求；早些时日产生的上海市跨行业的企业造反组织“工总司”总头目王洪文派代表来找徐景贤了，先提出他们坚决支



持“秀才”们的“革命运动”之后，又提出内外夹攻，打倒上海市委的总的联合行动方针；奉江青之命，专门从北京来上海“点火”，要打倒上海市委的著名造反头头聂元梓亲自来找徐景贤了，他们共同拟定了“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曹（荻秋）”的战略口号；谈话一直持续了八个小时，徐聂二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谈得很投机。“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毕竟来头不小，吸引了上海市名目繁多的造反组织都来和他们联络了。

在批斗大会上显露头角

但徐景贤又觉得自己干的动作还不算大，他决定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由“市革联”发起，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一个“彻底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给上海市委以致命一击，在打倒上海市委上，夺头功，以此确立自己在上海市政坛上的重要地位，同时，把上海市委打倒了，自己心里也踏实了，否则，他也担心会出现“打虎不死反被伤”的结果。经过和“市革联”几个头目商量后，开这次大会的日期，定在1966年12月18日下午，主要内容就是揭发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标是打倒陈丕显和曹荻秋。经过几天紧锣密鼓的准备，大会的工作落实了。

批斗大会一开始，“革命口号”就接连不断。毕竟是“秀才”们主办的大会，与“工总司”搞的批斗大会有所不同，四万多人大会秩序还是比较好的。大会所设的主席台上，端坐着徐景贤、郭仁杰这两位“市革联”头目，请来的王洪文等著名造反组织头目也坐在主席台上。台下早已经把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一些领导人揪来了，但没有对他们搞任何体罚，还给他们每人一把椅子，让他们坐在台下听从批判。只是时而勒令他们站起来“认罪”，然后还让他们坐下。

大会一开始，就是徐景贤作长篇发言。徐景贤过去长期处于“幕后”，他又比较“低调”，平时话语不多，人们对他不太了解，只知道他是个“笔杆子”。徐景贤在这次批斗大会上的这个长篇发

言，让他显露出了头角。徐景贤的口齿清晰，讲话抑扬顿挫，到一定时候还带些感情色彩，很有煽动力，这使有较高文化素养，对公开发言者十分挑剔的上海市机关干部们，对他刮目相看。徐景贤发言，逻辑性强，一环扣一环，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又有一点哲理。更主要的是，徐景贤的发言，历数了上海市委镇压“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揭发了陈丕显、曹荻秋执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其中有许多上海市委内部材料，包括徐景贤参与起草的重要文件。特别是，由于徐景贤是上海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了一系列讨论“文革”的会议，知道一些内部情况，他在批判材料中，把从“文革”一开始，上海市委研究如何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材料也抛了出来，这个影响就很大了。正是从这个长篇发言开始，上海市一些人对徐景贤另眼相看了，在场的王洪文等造反头目认为他“很有水平”，上海市委机关一些干部也认为他“有才干”，但人们不知，徐景贤这个长篇发言，是把上海市委领导干部们踏在脚下而使自己向上爬的一个最早筹码。他是背叛上海市委而为自己的进身之阶的。

成为张春桥的铁杆

徐景贤反戈一击，得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赏识。1967年1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动下，上海市的造反派夺了市委的权，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这次行动，徐景贤是主要参加者之一，在夺权中立了功。因此，“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时，他被张春桥、姚文元选定为“委员”。不久，“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经张春桥推荐，中央文革批准，徐景贤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连晋数级，一下子跃升为上海市的大官，对此，他对张春桥感激涕零，下决心今后要永远跟着张春桥走，一切唯张春桥之命是从。张春桥也十分信任他，他成了张春桥安插在上海市的一个得力干将。

上海市“人民公社”（后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初，上海的局势仍然动荡，张春桥等人既然已经把上海市委打倒，由他们掌了权，接下来就要

集中力量稳定上海局势，以维持他们对上海的统治。徐景贤对此心领神会，为张春桥稳定上海打先锋。从此，动荡中的上海，就活跃着徐景贤的身影。上海市的一个叫“上海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简称“上三司”）的造反组织，出动人马，包围了康平路，宣布夺了上海市的权。徐景贤给张春桥出谋划策，用软硬两手，把“上三司”给搞垮了。上海的一个叫“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的造反组织，派出数千人，冲进上海市主要党政机关，夺了华东局、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上海市各区的权，把主要的公章都夺了去。张春桥着急了，派徐景贤出面，找“红革会”头目谈判。徐景贤第一次显示出了他善于交涉，反应灵敏，口才好的本事，他口若悬河，向“红革会”头目讲明利害，给他们指明出路，只一席话，就把“红革会”头目说服，交出了夺去的大印。但“红革会”中一些“强硬派”却恨透了徐景贤。一天，正在“红革会”中做说服工作的徐景贤被复旦大学“红革会”成员抓走了，秘密关押在复旦大学1100号阅览室里。被抓的徐景贤，面对“红革会”成员的威胁利诱，始终没有“动摇”，在危险的处境中，他面不改色，坚持做说服工作。张春桥自然不能抛下他的亲信不管，派出数百名“工总司”队员，冲进复旦大学，寻找徐景贤，还派上海警备区负责人亲自出面，强令“红革会”交出徐景贤，这才救出徐景贤。事后，张春桥知道了徐景贤被抓之后的表现，对他更加信任了。1967年，上海市新产生的造反组织——“上海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和“支持联司总站”，向张春桥等人叫板，甚至喊出了“打倒张春桥”的口号。一心为张春桥卖命的徐景贤的心里十分焦急。他立即行动起来，在上海各造反组织中串连，以期孤立“联司”和“支联总站”。他还和王洪文一起，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了有几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声讨“联司”。会上，轻易不喊口号的徐景贤，带头高呼“联司必败”的口号，把嗓子都喊哑了。



在上海，徐景贤是以死保张春桥著称的，为了保张春桥，谁反对张春桥，他就和谁对着干，哪怕是过去的“战友”，他也要与之反目。

更使张春桥对徐景贤信任的，还有这样一件事情。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刚刚成立时，以徐景贤的才能和过去任上海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的职务，经张春桥提议，中央文革在拟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名单时，把徐景贤列为第三号人物，即名列张春桥、姚文元之后，当时上海人称徐景贤为“徐老三”。但是，不久，张春桥有意培养工人出身的造反派，原来名列第七位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洪文的地位上升，代替徐景贤的地位，成了“王老三”。无论是理论水平、文化水平、政策水平、工作能力，都不如徐景贤的王洪文名列徐景贤之前，徐景贤心里能服气吗？这一点曾经让张春桥十分担心，他还考虑过把徐景贤调到中央工作以化解矛盾的方案。但出乎张春桥意料之外，地位下降的徐景贤，处处尊重王洪文，全心全意帮助王洪文处理事情，有事也经常和王洪文沟通，一点也没有表现出不服气的情绪来。王洪文对徐景贤也十分满意，二人相处很好。这件事使张春桥更加看重徐景贤，认为他“境界高”，“善于团结人”，“没有私心杂念”。张春桥就更加重视和提拔徐景贤了。

1968年底，中央筹备召开九大，张春桥是筹备组成员，上海方面由他负责。他在内定王洪文为九大代表，在九大上当中央委员的同时，也把徐景贤定为九大代表，也要在九大上当中央委员。1969年4月，九大在北京召开，徐景贤作为九大代表，到北京出席了大会。由张春桥等人推荐，徐景贤还成为九大主席团成员。更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他在九大上还当选为中央委员。这可不一般。当上了中央委员，就意味着自己可以参与中央重大问题的讨论了，预示着自己今后会走出上海，前途无量。

在九大上整陈毅

徐景贤能够飞黄腾达，心里对张春桥感激不尽，从此以后，他站在张春桥的立场上，一切听张春桥的指挥，以此

报答张春桥的“知遇之恩”。徐景贤出席九大时，在九大小组讨论会上和王洪文一起整陈毅，是他在九大上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也是他向张春桥献上的一份“报答礼物”。

在九大召开之前，张春桥就处心积虑地要打倒陈毅，无奈，毛泽东要保陈毅，并且提议，陈毅要当九大代表。但张春桥不死心。1968年11月，张春桥授意徐景贤，和王洪文一起，组织上海一些人编写了一个题为《陈毅反动言论小集》。搞文字的东西，王洪文是外行，搞这个小册子的主要工作都由“秀才”出身的徐景贤承担。徐景贤立即把他在市委写作班子中的几个骨干找来，面授机宜，把小集子的体例、主要内容，都交待清楚了。他还日夜和这几个骨干一起搞这份材料。不久，这个小集就搞出来了，徐景贤安排印出几份，由他、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阅后，又作了一些修改，就定稿了，然后，由徐景贤安排印刷。这个小集中，把陈毅从1953年至1966年在各种会议上讲话、谈话加以断章取义，随意摘编，然后无限上纲，作为批判陈毅的材料。这个小集共九个部分，每一部分的标题都赫然给陈毅扣着政治帽子，例如“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顽固反对在各项工作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否定工人阶级领导，丑化工人、贫下中农”，“贩卖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美化和投降帝修反”，“坚持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个小册子，在九大召开之前，就在上海和南方一些九大代表中散发了。散发的目的，是为在九大上围攻陈毅做准备。

九大召开时，陈毅自然被分到华东组，陈毅又是上海市推举的九大代表，要参加上海小组的讨论。在小组讨论会的第一天，陈毅坦荡地走进会场，微笑着和上海出席九大的代表打招呼。但会场上，多数人不敢看他，在回避着陈毅的目光，只有几个老熟人上前和陈毅握手。敏锐的陈毅马上断定，张春桥他们又在捣鬼了。果然，还没等陈毅坐下，徐景贤突然领头高喊口号：“打倒陈毅！”

“陈毅反对‘文化大革命’罪该万死！”，“陈毅必须低头认罪！”

陈毅回头看了看徐景贤，从容不迫地坐了下来，点燃一支烟，把手中拿的会议材料慢慢地打开，抬起头，用炯炯有神的双眼，扫视了一下会场，用沉稳的语气说：各位同志，当选九大代表的标准共有七条，有四条是毛主席在关于接班人标准中早就讲了的，有三条是林副主席讲的干部标准。我陈毅不够这些标准，承蒙上海党选我为代表，我在此表示感谢。

徐景贤和王洪文立即抓住陈毅语词中所说的“上海党”这句话，说：陈毅这样讲，是分裂中国共产党。接着，由王洪文主持会议，开始批陈毅。王洪文第一个发言，他打开他们编的那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念一段陈毅的话后，批一阵。陈毅觉得有点不对头，为什么他们手中拿的材料我手里没有？但是，陈毅也不问，他心中已经有数，他们手里拿的，肯定是他们搞的黑材料。他从容镇定地坐在那里听着。王洪文发言之后，徐景贤接着发言，也是念一段材料上的话批一阵。讨论九大文件的会议，变成了批判陈毅的会议。批判者特别抓住陈毅那篇演讲，搞无限上纲。他们这个说，陈毅说刘少奇是他的老师，是为刘少奇翻案。那个说，陈毅说毛主席是个螺丝钉，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是恶毒攻击毛主席。还有人说，陈毅在历史上就一贯反对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跳出来反对毛主席。对此，陈毅只是微微一笑，他对这些人的做法，采取鄙视的态度。他们一个一个发言结束后，也不让陈毅说话，在那个场合下，陈毅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力。这次批判陈毅的会议，一直开了两个多小时。王洪文这才宣布会议告一段落。批判之后，王洪文这才装模作样地把《陈毅反动言论小集》送给陈毅一本。

九大闭幕后不久，全国各地开始整党建党，即重新建立各地各级党委。上海也开始组建市委。张春桥当上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姚文元当上了第二书记。第三书记，是王洪文，徐景贤也当上了市委书记（相当于现在的副书记——笔



者注),排名列在王洪文之后,是上海市第四号人物。在上海市的领导人中,他的排名,竟然在他原来的老领导马天水之前,因为马天水在九大上只是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72年,王洪文也调到中央工作。张春桥、姚文元都不在上海,徐景贤成了上海市的实际掌权人。虽然后来张春桥等人也倚重马天水,但徐景贤始终是张春桥在上海的大管家。

参与策划叛乱

自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结成“四人帮”后,就处心积虑地要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但由于中央还有一大批老干部担任领导职务,并且对他们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他们的阴谋一时难以得逞。他们考虑到了武力夺权的方案。但他们苦于手中没有枪杆子,于是,就打起了在上海建立第二武装的主意。上海是“四人帮”苦心经营的老巢,在王洪文的操纵下,上海民兵曾经发展到一定规模,并且有相当的武器装备,而且,上海民兵还脱离上海警备区领导,直接归王洪文操纵的上海民兵指挥部指挥。1975年,王洪文就以回上海“调查研究”的名义,策划建立第二武装。到1976年,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先后逝世,毛泽东病重,“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徐景贤在上海具体落实民兵训练和武装,以及生产武器等工作,更加尽心尽力了。

但是,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都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同志领导的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把“四人帮”抓了起来。华国锋为了稳住上海,第二天就通过中央办公厅,以开会的名义,调马天水进北京,并且把马天水也控制起来。马天水进北京开会,使聪明的徐景贤产生了警觉,他提出,要抓紧和北京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联系,问中央调马天水进北京,到底开什么会。但他们无论怎么样联系,也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联系不上。徐景贤又提出,要和到北京的马天水直接联系,当他和马天水的秘书联系时,马天水的秘书讲了一句暗语:“我的老胃病犯了”。徐景贤等人慌

了,继续打探消息,虽然答复含糊隐晦,但徐景贤等人判断:他们的“首长”被抓了,右派上台了。10月8日,徐景贤等人连夜在康平路召开市委常委紧急会议。市委常委紧急会议刚刚结束不到10个小时,又召开紧急会议。市委常委们的小汽车再次鱼贯开入康平路。

徐景贤紧急召开的这次上海市委常委紧急会议,在深夜举行。会议开始,徐景贤就一脸严肃地向大家宣布:北京发生了“右派政变”,“四位首长”可能已经被扣。你们看,上海怎么办?徐景贤的话音刚落,朱永嘉立即站了起来,大声说道:要准备和右派斗,要把上海搞成巴黎公社。现在,就要发表告全市人民和全国人民书,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右派政变了。如果不发告全市人民书,也要用特殊方式,发表赫鲁晓夫是怎样上台的材料。朱永嘉还没有说完,王秀珍就抢过来说:要动员民兵进入紧急状态,先出动2500人,再调动31000人待命,要突击发枪发子弹,派民兵连夜搞巡逻,永嘉同志现在就去准备造舆论的工作。其他几个参加会议的人也先后发言,提出上海要搞武装斗争的意见。徐景贤见大家讲完了,就综合他们的意见,宣布几项决定:一、现在就开始做武装斗争的准备;二、为了在关键时刻保持上海领导力量,防止领导人被意外杀害,常委分两拨,设两个指挥点,我和王秀珍分别为两拨的总负责,我和王少庸、张宜爱等去丁香花园,设一号指挥点,王秀珍和冯国柱等去上海市民兵指挥部,设二号指挥点。三、要向上海警备区做工作,争取他们支持我们。四、只留张敬标在市委常委办公室值班,联系各方面,有情况要及时向他报告。徐景贤还亲笔写下了两个手令,一个手令的内容是: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调3500人集中,35000人待命,晚上集中值班,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报社、电台的保卫。另一个手令的内容是:电台的警卫连要注意警卫,听从刘向贤同志指挥。在此时,徐景贤与情绪激动的朱永嘉、王秀珍不同,他反倒沉稳了下来,他俨然“上海起义”总指挥的样子,从容地布置这一切。在此时,他要

为“四人帮”看好上海这个“家”,要为“四人帮”尽忠。

被中央稳住

上海方面的一举一动,都被中央得知。华国锋从稳定大局出发,一方面,调动南京部队三个师,向上海方向靠近,另一方面,也采取了麻痹对手的策略。他并不向全国公布逮捕“四人帮”的消息,而只是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这样的消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共同作出两项决定,即《关于建立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过了几个小时,中央又下达了文件,宣布: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华国锋担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这个消息是10月9日凌晨发表的,徐景贤很快就知道了,他又费起心思猜测起来:如果“首长”们被抓,会马上听到消息的,怎么现在还没有消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作出这两个决定,说明中央正在开政治局会议。四位“首长”都是政治局委员,一定也参加了政治局会议,说明他们没有出事。9日一大早,王秀珍突然打来电话告诉他,马天水刚刚亲自打电话给她了,告诉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身体很好,工作很忙。中央正在筹备召开一个重要会议。徐景贤刚放下电话,就接到了马天水从北京给他打的电话,内容和王秀珍说的一样。徐景贤悬着的一颗心落了地。他根本不知道,马天水是按中央要求打的电话。中央让马天水打电话的目的,就是要稳住徐景贤等人。

徐景贤的心没有松弛多久,立即又紧缩起来,原来,就在9日晚上,他又接到了马天水的电话,转达了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要徐景贤、王秀珍二人于明天上午去北京开会。徐景贤的脑筋又紧张地旋转起来:中央的开会通知为什么要让马天水转达?马天水为什么不在上午的电话中告诉我们?莫不是“首长”真的出了事?莫不是马天水在骗我们?但



他转念又想,以马天水和张春桥的关系,他总不会骗我们吧?但是中央办公厅有通知,他和王秀珍又不能不去北京。徐景贤想起了张春桥经常对他说的《红楼梦》中的一句话:“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做了有去无回的打算。9日晚,徐景贤向他的妻子郑重道别,10日一大早,就和王秀珍赶往机场。在机场上,徐景贤向来送行的“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们交待:我们去北京,如果两天之内没有电话,你们就发动起义,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徐景贤、王秀珍乘坐的飞机,在半路上多次被检查,徐景贤心中已经明白了八分,他们一到北京,就被中央办公厅的干部接到住处,实际上被控制起来。他此时彻底明白了:“四人帮”已经被抓了,他们的“首长”完了。他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之中,同时,他也预感到,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要从此完结了。正在胡思乱想之际,中央派人来找他谈话了,同样也是要求他给上海方面挂电话,稳住上海。徐景贤不得已,只好给上海打电话。但是,他此时已经不能再说“首长”们身体都好,工作很忙的话了,而是含糊地说:你们一定不要乱动,等一两天我回去再说。此时,上海的“四人帮”死党已经从外电中得知“四人帮”被抓的消息,也判断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都叛变了,他们打算制造叛乱,还制定了“捍一”、“方二”两个武装叛乱计划,研究了停水、停电,“立即起事”的种种方案,但徐景贤等人已经被控制在

北京,上海方面的“四人帮”死党群龙无首,无人决策,行动不起来。

13日,徐景贤果然飞回了上海,不过,他这次是和马天水、王秀珍一起飞回来的,而且,比他们早一步来上海的中央工作组已经控制了上海局势。当天下午,上海市委常委在锦江小礼堂召开会议,传达中央文件。小礼堂已经被上海警备区派来的警卫控制。会上,马天水传达了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打招呼会议精神,徐景贤传达了中央印发的毛主席批评“四人帮”的话。还没有等马、徐传达完,“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立即叫了起来,有的高喊要拼命,有的大声哭泣。徐景贤出面装好人了,他说:你们不要再哭了,也不要闹了,否则将加重他们四个人的罪行。徐景贤说完,便阴沉着脸,不再说什么了。但是,参加会议的人都听清楚了:徐景贤已经改口了,他说他们四个人有“罪行”。徐景贤的这些话,让“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认为他叛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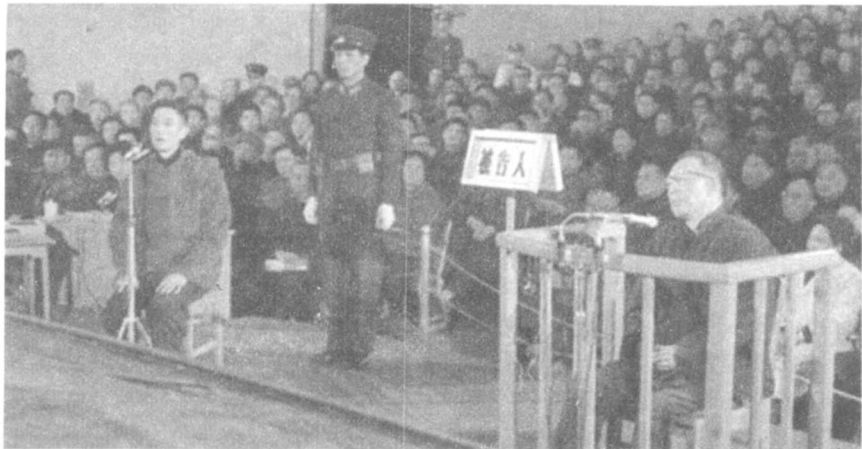
接下来的几天,徐景贤仍然以市委领导人的身份在一些会议上露面。10月24日,上海的人们在人民广场召开的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群众大会上,还看见徐景贤坐在主席台上和群众一起鼓掌。但不久,徐景贤就从上海政治舞台上消失了。10月27日,中央改组了上海市委,苏振华任第一书记,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一切职务。徐景贤也被停职交待问题。他又忙了起来,不过,他此时忙的是写检讨材料。

受到公审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几年,徐景贤处在被隔离审查的状态。1980年,中央决定公审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主犯。在公审“四人帮”中的张春桥、王洪文时,徐景贤曾经出庭作证。这是时隔数年,人们再次见到徐景贤。他已经明显老了许多。徐景贤在作证时,对于他们在上海策划搞反革命叛乱的基本事实,还是讲清楚了。他在1980年12月13日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作证时,交待了他们在1976年10月开策划武装叛乱的会议,具体讨论了设指挥点,由他执笔开列了指挥点人员名单,亲笔写下了调动上海民兵的手令等罪行。他在作证时最后还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了,只要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入到一片血海之中。张春桥过去多次引用过《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用来开导我们,启发我们。他又多次说过‘准备杀头’这样的话,用来对我们进行反革命气节教育。当我们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我确实是准备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个人豁出一条命去干了。我替‘四人帮’卖命,与人民为敌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徐景贤因为参与“四人帮”的反革命活动,也被提起公审。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成为他的主要罪行之一。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在监狱中服刑的徐景贤反而想开了。他没有多少苦恼和忧郁,情绪乐观,每天在监狱中很有规律地生活。至于生活待遇,还是很好的,吃的伙食很好且不说,住的也很宽余。他的妻子也曾多次去探望他。坐牢后,他的时间真的充足了,就利用这段时间读书。他又捡起了他年轻时的爱好——写作,也写出了许多东西。徐景贤刑满释放后,上海市委一些老人曾经多次见到他,他的身体依然很好,还是满头黑发,头脑清楚,反应灵敏,说话逻辑性很强。出狱后,他住在组织上另外安排的住房中,和妻子生活在一起。他妻子有退休金,组织上也给他发一些生活费,生活上是不愁的。2007年10月,徐景贤在上海病逝。■



1980年12月4日,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对张春桥进行庭审调查。徐景贤(左)就张春桥制造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出庭作证。



40岁以上的人大都知道王秀珍的名字。她曾是上海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上海风云一时的人物。她头脑清楚，记忆力强，口才好，讲话时，不用拿任何稿子，就可以滔滔不绝地讲很长时间，并且逻辑清晰，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同时，大家也都知道，她是“四人帮”的亲信，在“文化大革命”中紧跟“四人帮”，犯下了许多罪行，“四人帮”垮台后，她受到了党组织的审查，最后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人们很少知道，王秀珍走的是怎样的人生之路。

“四人帮” 上海党羽人生浮沉录

之三



■霞飞

童年的苦难生活

1934年11月17日，王秀珍出生在辽宁省辽阳市安平屯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她的父亲叫王崇勤，母亲叫刘玉兰。都是没文化老实巴交的农民。在王崇勤和刘玉兰夫妇生了两个女孩后，第三个出生的是王秀珍，此后，刘玉兰又生了三个女孩。由于生活实在困难，王秀珍的二姐很小就饿死了，大姐则被卖给了别人，但王秀珍的大姐被卖到那一家后，也饿死了。这样王秀珍很小就成了家里姐妹的老大，小小年纪就承担起家里的部分劳动。

王秀珍八岁那年，他家发生了一场重要变故。这一年发大水，把安平屯的地全都淹了。王崇勤一家受灾最重，家里种的西瓜地、香瓜地、菜地成了一片汪洋，全年一点收成也没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王秀珍的大姐被卖，不久饿死。这件事使王秀珍终身不忘，也使他后来对旧社会充满了仇恨，对新社会无比热爱。当然，这是后话。

安平屯大水过后，土地变得板结了，种不了菜了，王崇勤一家在那里已经生活不下去了，只好进辽阳城里另寻生路。王崇勤带一家人进了辽阳城才发现，在这里，日子也不好过。他没有手艺，只有一身力气，而当时进辽阳城里寻找生路的农民有很多，都是只有

力气，没有手艺的人，给人家搬运、扛抬等力气活早就有许多人在干了，他已经找不到这样的力气活了。没有办法，王崇勤只好摆起了小摊，卖一些水果、花生、香烟、瓜子之类，勉强维持生活。王崇勤一家住在城边一个四面透风的破房子里，随父母进城的王秀珍仍然要承担部分劳动。她要跟父母去摆摊，还要带着三个妹妹到处去拣煤渣，回来供全家生炉子取暖用。这样，辽阳城里就多了一个拣煤渣的女孩。每到冬季，王秀珍姐妹四人就手拿铁丝筛，到垃圾场去，等倒煤渣的推车一到，立即扑上去，扒那些燃烧未尽的煤渣，手常常被烫红，身上、脸上全是黑灰。王秀珍上不起学，她十分羡慕那些年纪和自己一样大，背着书包上学的孩子。幼年留给王秀珍的记忆最深的，一个是饿，一个是冷，再一个就是官老爺欺负小摊贩。王秀珍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最爱听的样板戏选段，就是李玉和唱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因为这使她想起了旧社会自己从小就受苦受穷又要到处奔波的生活。

获得新生被安排工作

1945年，日本人投降了，辽阳来了帮助穷人翻身解放的共产党。但接着，国民党军队来了，和共产党争夺东北，打了几年仗，到1947年，辽阳才

真正获得解放，人民才真正当家作主。王崇勤一家也从苦海中爬了出来，得到了解放。王崇勤一家，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王秀珍对共产党更是十分感恩。王崇勤作为群众积极分子，参加各种活动。王秀珍也当上了儿童团员。此时的王秀珍已经十多岁了。那时，共产党的政策，是帮助穷人家的孩子上学念书。这样，在共产党地方政府的帮助下，获得新生的王秀珍，又进了小学。

进了小学的王秀珍，十分珍惜这个迟到的学习机会。她进入学校后，学习上极为刻苦。仅仅两年的时间，她就学完了小学六年的课程，达到了高级小学毕业的水平。她的学习成绩，平均是85分。刻苦学习、强行记忆，锻炼了她的记忆力，后来她脑子清楚，能够记忆很多数字，口才也十分好，与她在这段时间的学习经历是有直接关系的。

仅仅两年，王秀珍就拿到了高级小学毕业证书。学校给了她这样的评语：“学习成绩总平均八十五分，出席良好，能够模范遵守学校各种制度。”在那个时代，高级小学毕业的王秀珍，已经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又有学校方面



给的比较好的评语。可以说，王秀珍在进入社会之前的起步阶段，就已经有了好的开头。

1949年建国后，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始恢复和发展生产。1950年，辽阳建立了纺织厂，需要招收工人，优先在辽阳城里贫苦劳动者中招收。此时，王崇勤因为在旧社会长年劳累，已经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病，不能起床，自然也当不上工人了。刘玉兰没有文化，也不能去当工人。地方政府考虑王崇勤一家生活困难，应该有人工作，有收入，才能生活下去，就有意让王秀珍参加工作。当时，王秀珍刚刚16岁，便进辽阳纺织厂，当上了一名纺织工人。

1950年3月，身材又小又瘦的王秀珍走进了辽阳纺织厂的大门。她把高级小学毕业证交给了厂领导后，厂领导和她谈了话，鼓励她牢记旧社会的苦，牢记翻身解放后的幸福生活，听共产党的话，努力工作，为新中国建设做出贡献。这是组织上第一次和王秀珍谈话，这次谈话对王秀珍的影响很大。

王秀珍被分配到织布车间当工人。她入厂后，埋头苦干，每天都最早一个到车间上班，把车间里打扫干净，把机器擦拭得十分光亮。工作时，她虚心向老师傅学习技术，反复钻研，16岁的她，很快就赶上了一个成年老工人的技术水平，生产量也是全车间第一。王秀珍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十分高兴，她把工资全部交给父母，父母自然高兴。她一个人的工资，供全家吃穿用和妹妹念书的费用，是紧张一些，但全家有了固定收入，加上她母亲仍然能干一点零工，家里的日子可算能过得去。当时的王秀珍有一个十分朴素的想法：共产党使自己全家得到解放，我要为共产党多劳动；我劳动，共产党给我工资，以供养我全家。

当时党的基层组织是十分重视从工人中培养先进分子的。王秀珍埋头苦干，表现积极，生产指标全车间第一，自然就被组织看到了。党组织决定把王秀珍作为重点培养对象。经常找她谈话，帮助她提高觉悟。还让她多读一些宣传党的知识、讲革命道理和时事政治、党的政策的书。这样，王秀珍也慢慢地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1952年9月，入厂工作仅仅两年半的王秀珍被组

织上吸收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又经过了四个月的考验，王秀珍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的王秀珍，工作更加努力了。她长期保持每天最早来车间劳动的习惯，并且帮助其他人劳动，她生产的产品数量多、质量高，是全厂最优等级的产品。组织上决定树她为先进典型。这样，她先后被评为车间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辽阳纺织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辽阳市先进生产者，辽宁省劳动模范，东北地区劳动模范。她还先后被选为辽阳市人民代表，辽宁省人民代表。

在这段时间里，王秀珍是积极向上的，是进步的，她也确实为国家做出了一定贡献。当然，这和当时那个大多数先恐后、努力进步的时代是分不开的，和组织上的培养是分不开的，但也不能否定王秀珍的个人因素。她从小生活在苦难中，是共产党来了才得到新生，是共产党给她一家幸福。她从心里感谢共产党，有了这个朴素的感情，她在工作中自然积极努力，一心要报答共产党的恩情。经过组织上的培养和教育，她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在思想上有了提高，这些都是促使她进步的重要因素。

被组织推荐到上海学习

1956年，国家即将进入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阶段，党中央把培养工人阶级技术人员和工人干部，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因此，党组织也考虑了进一步培养王秀珍的问题，认为她劳动积极，思想进步，是先进生产者，人民代表，但按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衡量，她还有差距，现在国家纺织技术有了新进步，以后还要大量使用更加先进的机器，为了进一步培养王秀珍，应该让她去学习纺织新技术，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王秀珍正好也有进一步学习新技术的愿望。组织上的培养打算和王秀珍的个人愿望合在了一起，这样，王秀珍就于1956年8月报考了上海纺织工业学校。组织上的推荐，加上王秀珍考试成绩也很好，很快，她就被上海纺织工业学校机织科录取，学制为四年。

王秀珍为什么要考上上海纺织工业学校？这是因为上海是中国乃至亚洲纺织工业最发达的地方，有大量生产设备较为先进的纺织厂。在这个基础上，上

海建立的纺织工业学校，也是当时中国在纺织技术理论方面水平最高的学校。该学校虽然是中专，但学科齐全，学制和大学本科相同，是四年，四年下来，学生能全面掌握世界上较为先进的纺织技术和理论。而王秀珍的个人文化条件也不高，是高级小学毕业，她能从一个高级小学毕业生这个起点，直接考上上海纺织工业学校，已经不简单了。

王秀珍刚刚入学时，在政治上，起点比其他学生要高。因此，学校方面对她十分重视，让她当班级的干部。王秀珍入学后，先后担任过副班长、班长、团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团总支支部委员、民兵排长等职务。她在做这方面工作时，也很积极，表现出了一定的组织才干。但是，她在文化知识上却不如其他同学。她没有上过中学，一下子学中专课程，她感到很吃力。入学之初，她的学习成绩不太好。对此，她也很苦闷。曾写信给辽阳纺织厂领导，讲述自己的苦闷心情，辽阳纺织厂的领导回信对她进行鼓励，她个人也有不甘落后、不服输的性格，因此，她的学习方面相当刻苦。

在学校的四年，她带着满腔热忱，把全部精力都用到了学习和班级的组织活动上去了。她的同学后来回忆起王秀珍在冬季一早就起来，身穿棉衣，站在学校路灯下读书的情形，可见当年的王秀珍确实是用功学习的。由于王秀珍学习刻苦，她的学习成绩逐渐上升，很快就名列前茅。毕业考试，她六门功课中，有四门是五分，两门是四分。这个成绩在上海纺织工业学校中，算是很好的。

毕业后分配在上海工作

王秀珍于1960年8月，在上海纺织工业学校毕业，得到了中专文凭。这在当年，已经是相当高的学历了，按当时的政策，中专毕业生按国家干部安排，列入知识分子行列。这一年，王秀珍26岁。

按规定，纺织工业学校毕业学生要实习一年。实习地点由组织安排。王秀珍被安排到上海纺织工业局设计室实习，时间为一年。实习期间，王秀珍表现非常好。分配给她的设计任务，她总是较快较好地完成，然后又主动要求其他设计任务。她的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受到了设计室上下的好评。王秀珍



的表现也让许多年轻人佩服。在此期间，纺织局一个年轻干部向她求爱，他们很快就坠入爱河。当年就结婚了。

一年实习期满后，王秀珍面临分配工作的问题。本来，王秀珍是想毕业后回到辽阳纺织厂工作的。但当时她已经与在上海工作的这个干部结婚了，算是在上海安家了，回去工作的事情就另当别论了。更主要的是，当时国家正急需技术干部，培养的技术干部要由国家统一分配。王秀珍是被列入统分行列的一个。这样，她就安心等待组织分配了。

在分配问题上，王秀珍具有其他同学所没有的优势条件。组织上考虑到了王秀珍是中共党员，有过工作经历，当过副工长，又是省人民代表，东北地区劳模，学习成绩很好等方面条件，加上王秀珍已经与在上海工作的爱人结婚，就决定把王秀珍分配到上海国棉三十厂工作。

组织上分配王秀珍去国棉三十厂，也是有考虑的。国棉三十厂是上海市的一个老厂，在解放前就有，当时叫仁德纱厂，是资本家开办的。解放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国营工厂，但该厂的技术人员大多是旧社会留下来的。当年被称为旧知识分子，也算是改造对象。组织上认为，王秀珍是工人出身，是共产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派她去那里，是要改变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局面，逐步让王秀珍这样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充当该厂技术骨干。

但是，王秀珍毕竟是刚刚毕业的学生，虽然实习过一年，在技术方面还不能“挑大梁”。因此，王秀珍去国棉三十厂报到后，组织上先让她到厂技术档案管理处管理技术档案，让她先熟悉全厂的技术资料，然后再投入工作。王秀珍刚到三十厂时，工作热情不减当年。她仍然是最早上班、最晚下班的一个。正是因为有这股劲，她很快就熟悉了全厂的技术档案。1961年，她被顺利地定为国棉三十厂的技术员。不久，国棉三十厂领导把她派到织布车间当工长，兼任技术员。从此，她作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一员，正式投入厂里的生产管理和技术工作。

王秀珍到上海国棉三十厂后，按她本来的心愿，是想在这个地方好好

干一番事业的。但是，事情往往不是她想象得那么好。首先是她连生了两个孩子。这使她背上了沉重的家务包袱。

虽然她爱人也十分卖力帮助她操持家务，可作为母亲，带孩子方面的许多事情，是非她不行的。每天她要给全家做饭，要给孩子洗衣服，要买菜，要收拾屋子。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王秀珍花在家庭上的精力多了，花在工厂方面的精力自然也就少了，这使她在生产方面再也创造不出大大超过别人的业绩了。相反，由于精力分散，她还经常出错。一次，王秀珍在设计方面出了一个错，使车间生产受到了损失。车间主任批评了她，还把这件事反映到厂领导那里，厂领导在大会上批评了她，这使过去头上带有东北地区劳模、辽宁省人民代表光环的王秀珍很没有面子。虽然王秀珍表面上没有说什么，也表现出接受批评的样子，但人生之路一向很顺，自参加工作后总是受到领导重视和表扬的王秀珍，心里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对她来说，实在是反差太大了。这件事，使王秀珍对厂领导产生了怨恨情绪，由此结下了她与厂领导矛盾的种子。

另一件事是厂领导没有再推荐她当区人民代表，而是推荐了另一位老劳模。王秀珍对此是很有想法的。她原来就是东北地区劳模，比厂领导推荐的那个劳模的级别要高，她又曾经是省一级的人民代表，现在，连区一级的人民代表都当不上，这使她有受到冷落之感。她自己心里认为，到了上海，是上海人的天下，自己一个东北人独闯上海，人生地不熟，这里的人欺生，有意使自己当不上人民代表。从此，她多少有一些心灰意冷，在行动上难免消极一些。时间一长，厂领导对她很不满意，有时就向她指出问题，批评她几句，这就使她和厂领导之间的矛盾更深了一步。

王秀珍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到厂后一向自视甚高。但是，厂里认为老专家还是技术全面些，有经验，因此，对原来留厂的老专家十分尊重，有关键的技术问题，还是请老专家来解决。对王秀珍则不十分信任，她出错后，对她更冷落了，这使王秀珍认为厂领导不重用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而是重用旧知识分子，在用人方面有“阶级阵线不清”的问题。

还有一件事是职务问题。王秀珍

来上海学习之前，就已经是辽阳纺织厂的副工长了，经过四年学习，取得了中专学历，当上了技术员，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没有给她安排高一点的职务，只是当上了工长，跟她学习之前的职务差不多，这使她很不高兴。另外，当工长，就要在一线，要参加许多劳动，要带班，要检查质量，具体事务多，忙乱。这使已经是两个孩子妈妈的王秀珍感到十分疲惫。她曾经向组织上提出要到科室去当脱产的技术员，但组织上一直没有考虑。后来，她通过她实习时建立的关系，借调到上海纺织局管理资料，她想，这个工作轻闲，反正自己也难以进步了，就这样当个管资料的干部，一辈子也就行了。但使她没有想到的是，国棉三十厂认为，厂里缺少懂技术的基层干部，要求借调到上海纺织局的王秀珍回到工厂，继续当工长。这使王秀珍极为恼怒。她认为这是厂领导有意整她。从此，她与厂领导的矛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

“四清”和“文革”中崭露峥嵘

王秀珍心里对厂领导有气，但在言行上却不敢表现出来，因为厂领导掌握着她的命运。正在这时，四清运动开始了。这是1964年的事情。

按当时中央规定，工厂搞四清，一开始主要是根据农村四清的经验，先查账目，清经济。王秀珍是共产党员，出身好，当过东北地区劳模和辽宁省人民代表，历史清楚，在政治上可靠，因此，她被选去搞厂里的四清运动。

四清一开始，王秀珍就把有关文件全部看了一遍，然后，按她负责的范围，到各车间去了解情况，特别是了解领导干部的经济情况，征求群众的意见。发动群众阶段，她到车间去宣传，也搞个别串连，在个别串连中，她与厂里一些对领导干部有意见的人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这是她后来造反时，能够很快拉起造反队伍的基础。她还和一些四清积极分子一起查账，对一些贪污行为，有所揭露。但更主要的，是划阶级队伍，按出身划阶级阵线。那时，王秀珍就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厂党委在党的组织发展等工作中不重视阶级成份，重用了旧社会过来的私方人员，因此在干部路线上也存在严重问题。她还认为，厂党委官僚主义严重，不民主。总之，在那时，她已经对厂党委形成了一



种“成见”。

四清运动中，王秀珍原以为自己这个四清积极分子会受到重用，没想到，她一直没有被重用，还是让她当工长，连一个车间副主任都没有让她当。她对厂党委领导干部的意见更大了。

正在此时，“文化大革命”爆发。1966年5月，中央下达了“五一六通知”。一开始，不大注意上边政治动向的王秀珍，对“五一六通知”只是一般地看一看，虽然也觉得提法上与四清文件相比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并没有感到会有重大变化，她还是把“五一六通知”当作四清文件的发展来看待的。但到当年6月，情况不同了。《人民日报》上接连发表重头文章，提出了造修正主义的反对的问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问题。这使王秀珍嗅到了一种大风雨来临的味道。过去长期被家庭、孩子拖累，没有时间看报刊杂志的王秀珍，开始注意看报纸杂志了。一开始，她每天都要到处找《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找来后，仔细看上边的重要文章，逐字逐句地领会文章中的精神实质。后来，她干脆自己订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对上边的文章反复阅读。此时，她对政治到了痴迷的程度。

王秀珍是个聪明人，她对政治有很强的敏感性，她从读到的重要文章和传达的中央关于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中，体会到：现在中央的精神，就是要打倒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发动群众，搞自下而上的革命。

中央要搞“文化大革命”，国棉三十厂也只能按上边发下来的文件，动员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这样，在这个厂里就出现了大字报，而且数量逐步增多。从1966年5月下旬起到6月初，该厂就已经贴出了上千张大字报。

在这些大字报中，唯独没有王秀珍的。王秀珍不是不关心厂里的“文化大革命”，相反，她时时关心此事。她每天都到厂里指定贴大字报的地点去看大字报，有的大字报贴出不久就被新的大字报覆盖了，她没有来得及看，就到厂党委办公室去找来大字报底稿看一看。王秀珍只看大字报，自己不贴大字报，谁也不知道这个对厂党委意见很大的四清积极分子，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正在大家猜测之时，1966年6月11日，王秀珍的大字报出现了，这张大字

报一贴出来，就在全厂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这张大字报后来被编为1051号，标题是：《厂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冷冷清清》。

这张大字报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王秀珍在“文革”初期就已经与厂党委决裂，开始带头向厂党委造反了。

这张大字报，是王秀珍考虑了很长时间后，串连了一些对厂党委有意见的人一起商量后写出的。商量时，王秀珍提出，现在厂里贴出的大字报都没有接触厂党委的实质问题，而厂党委的实质问题，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问题。我们的大字报要集中到这一点上。打算和王秀珍一起造反的人同意这个观点，于是，大字报稿由王秀珍执笔写成，由他们中间一个毛笔字写得好的抄清。王秀珍第一个在大字报上签了名，与她一起在大字报上签名的，共有11个人。

这张大字报首先质问厂党委：为什么捂阶级斗争的盖子？为什么把厂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接着，大字报分三个部分给厂党委扣上了三项大帽子。第一部分：执行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第二部分：执行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第三部分：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不好。

这张大字报与其他大字报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第一次明确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厂党委；它第一次把厂党委的问题上升到路线问题的高度，此外，大字报的措词也十分尖锐。谁都能看得出来，这是一张政治性极强的大字报。正因为如此，这张大字报一贴出来，就在国棉三十厂引起强烈震撼。

这张大字报贴出来后，厂党委虽然认为王秀珍这是带头向厂党委造反。但由于他们也不了解“文革”政策，感到不好处理，就把大字报抄了一份，送到上海纺织局党委。上海市纺织局党委对这张大字报十分重视。他们反复研究后认为，应该报送市委。市委研究后，认为国棉三十厂的这件事情，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种动向，不能等闲视之。市委决定，向国棉三十厂派驻工作队，指导那里的“文化大革命”。

出任厂“文革主任”

市委工作队进驻国棉三十厂后，经过一些调查研究，认为王秀珍带头贴

出这张大字报，不是简单的事。王秀珍是共产党员，是老劳模，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简单说她反党，恐怕站不住，而且，跟王秀珍一起贴大字报的就有10个人。他们贴出后，拥护的人也不少。因此，工作队并没有贸然行事，而是根据中央关于工厂企业搞“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决定先在国棉三十厂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文革会”）。这个“文革会”，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指导全厂工作的机构。按规定，“文革会”成员由选举产生，特别是主任一职，要在全厂职工大会上竞选产生。

王秀珍听说这一消息后，立即决定参加“文革会”主任一职的竞选。她着实准备了一番。在竞选大会上，王秀珍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厂党委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揭发。在这次演讲中，王秀珍表现出了她的口才天赋。这一点让她得分不少。但最让她得分的是：她打着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支持群众大民主的旗号，加上她是共产党员、老劳模、曾任省一级人民代表，贫农出身。在那个年代，这些条件使厂里群众、工作队都很信任她，而那些跟她一起写大字报的人就更拥护她了。这样，王秀珍就顺利地当上了厂“文革主任”。

王秀珍当上厂“文革主任”后，一下子跃升为厂领导干部。她感到了志得意满，同时，她也感觉到，只有紧跟“文革”潮流，向上造反，才能使自己站住脚，干一番“事业”。

王秀珍当上厂“文革主任”后，没有把精力放在抓生产上，而是放在了搞“文革”上。这一点，与上海市委工作队来国棉三十厂的工作方针不相合。时间一长，工作队对王秀珍不满意，王秀珍对工作队也有意见。

王秀珍当上厂“文革主任”后，继续反对厂党委，她仍然与厂里那些积极造反的人保持密切联系，经常召集他们秘密开会，研究如何向厂党委“发起进攻”、打倒厂党委一班人的问题。但是，工作队按照市委关于在党委领导下有领导有秩序地搞“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要支持厂党委工作的。工作队也认为，厂党委没有路线问题，工作中虽然有缺点，但是，这些是会妥善解



决的，不能打倒厂党委及其领导人。在这方面，王秀珍与市委工作队存在原则上的分歧，相互矛盾也越来越深。王秀珍认为市委工作队是“保皇派”；市委工作队认为王秀珍是捣乱分子。这样一来，她与市委工作队之间的矛盾自然越来越尖锐化。

1966年9月，王秀珍开始公开反对市委工作队，她提出，市委工作队是国棉三十厂“文革”运动的绊脚石，应该搬走这个绊脚石。她开始召集那些紧跟她造反的人开秘密会议，研究赶走工作队的问题。在厂领导干部召开的工作会议上，王秀珍公开指责市委工作队，工作队也对王秀珍进行批评，双方闹到了势不两立的程度。这时，王秀珍手下的人开始公开贴出“市委工作队滚回去！”的大标语，还贴出了不少反映工作队问题的大字报。搞得工作队在国棉三十厂十分被动。但是，工作队在市委的支持下，并没有退步，仍然坚持在国棉三十厂，并且仍然支持厂党委领导人开展工作，还在群众大会上批评王秀珍。这使王秀珍受不了。于是，王秀珍开始到市委去告工作队的状。那时，她几乎每天都跑到市委接待室去反映工作队的问题。一方面，工作队是市委派的，执行的是市委的工作方针，没有错；另一方面，王秀珍作为厂“文革主任”，带头反工作队，背后还有许多支持者，因此，市委对此很难办，没有表示什么态度。王秀珍也有一股韧劲，她几乎一天一趟，去市委

告工作队的状。

结识王洪文

一天，王秀珍去市委接待室告市委工作队的状，见前边有一个长得很帅的年轻男子，操着东北口音，也在告市委派到他们单位的工作队的状。王秀珍便凑上去和他聊了起来。一聊才知道，此人叫王洪文，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干事，是该厂一个造反队的头头，前不久去北京告他们厂党委的状，同时在北京还搞了串连活动，现在刚回上海。同在纺织系统，同是反对市委工作队，同是来市委告状，同是东北人，同是造反带头人。他们之间立即有了许多共同语言。王秀珍向王洪文讲述了国棉三十厂党委的问题，市委工作队的问题，介绍了她带头给厂党委贴大字报的经历。王洪文对她表示坚决支持。王洪文也向王秀珍讲自己在国棉十七厂的造反经历，介绍了自己前不久去北京串连的情况。二人越谈越投机。互相引为政治上的知己。

临分手时，王秀珍邀请王洪文去国棉三十厂去介绍他们到北京串连的情况，王洪文一口答应了。第二天，王洪文就到国棉三十厂去了。王秀珍和她手下的造反骨干们早就等候在那里。

王秀珍把王洪文迎到厂小会议室，国棉三十厂的造反派们已经在那里聚齐了。王秀珍把王洪文介绍给大家，并且请王洪文讲话。王洪文也不客气，他一坐下，就口若悬河地讲了起来，讲他是怎么样造国棉十七厂党委的，讲他是怎么样到北京告状的，讲他在北京

到北京后的所见所闻十分注意，同时，她也对王洪文的组织能力、口才、冒险精神，从心里佩服。她已经把王洪文当作自己的榜样了。王洪文的讲话，受到了国棉三十厂造反派们的热烈欢迎，也鼓舞了国棉三十厂造反派们赶走工作队的勇气。只这一次讲话，王洪文便把国棉三十厂的造反派的人心收买了。王秀珍代表国棉三十厂的造反派们表示，今后他们都听王洪文的。从那以后，王秀珍一直紧跟王洪文，直到1976年“四人帮”覆灭。

加盟“工总司”

1966年11月初，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企业界造反组织——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立。这个组织成立时，王秀珍并未参与。这是为什么？原来，当时，以王秀珍为首的国棉三十厂造反派组织和以黄金海为首的国棉三十一厂的造反组织，已经铁了心听王洪文的，王洪文成了他们实际上的头目，王洪文发起建立“工总司”，自然也不需要王秀珍再去参与。黄金海倒是去参加了研究成立“工总司”的会议，但他一切听王洪文的，王洪文实际上也是国棉三十一厂造反派的头目。“工总司”一成立，王秀珍立即表示：国棉三十厂的造反派要加盟“工总司”，而以黄金海为首的国棉三十一厂造反派则早就表示要听王洪文的指挥。这样，王洪文手里实际上握着国棉十七厂、国棉三十厂、国棉三十一厂三个厂的造反派力量，这是王洪文能够发起建立“工总司”的基础，也是他此后能够成为“工总司”“总司令”的实力基础。

王秀珍率领国棉三十厂的造反派加盟“工总司”后，立即成为“工总司”的中坚力量。“工总司”有什么行动，他们都走在最前边，抢商店里的红布做袖标，他们走在前边；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他们走在前边；向上海市委发难，他们也走在前边。他们成了王洪文手下的“王牌”，而王秀珍则是这张“王牌”的核心人物。只要是王洪文交待她办的事情，她就全力去办。她也确实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在她的活动下，参加“工总司”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凡是经过她的活动参加“工总司”的人，都是死心塌地紧跟王洪文的铁杆造反派。



左起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

和红卫兵头头们开座谈会的，讲他回上海后把全厂造反主力联合在一起共同造反的经过。王秀珍认真地听着，还手拿小本子，不时地记下王洪文的话。她对国棉十七厂造反派的造反经验十分感兴趣，对王洪文率领厂里的造反派



王洪文在上海掀起一个个政治狂潮时，王秀珍都是铁杆的支持者和参加者。当王洪文和张春桥、姚文元建立了政治上的同盟关系，成为左右上海政治局势的人物后，王秀珍也扬眉吐气起来。她真的赶走了上海市委工作队，打倒了厂党委领导人，自己成为国棉三十厂真正的“一把手”。她本人也成为上海知名人物。当年在上海，没有人不知道工人出身、当过省人民代表和东北地区劳模的造反派头目王秀珍的，王秀珍以她的“红牌子”和口才，也笼络了不少造反派。这些造反派跟着她和王洪文冲冲杀杀，把上海搅得天翻地覆。王洪文对王秀珍也十分器重，把她拉入“工总司”常委的行列。

连续跃升

1967年1月，上海的造反派们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操纵下，夺了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权，成立了“上海公社”。王秀珍紧跟王洪文，是参与夺权和建立“上海公社”的主要人物之一。“上海公社”成立后，王秀珍也成为公社委员。当时，中央虽然支持造反派夺权，但不同意新政用“上海公社”的名称，因此，“上海公社”成立没有几天，就按毛泽东的意见，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酝酿成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时，王洪文推荐王秀珍当副主任。张春桥了解了王秀珍的情况后，十分高兴，他认为，王秀珍具有代表性，她出生在贫苦人家，在旧社会受过苦，解放后当上了纺织工人，连年当劳动模范，后来成为共产党培养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又在厂里当基层干部。这样的人造“走资派”的反，有号召力，这样的人当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也表明革命委员会的阶级性，有影响力。于是张春桥很快就答应了，上报中央文革后，中央文革也就同意王秀珍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这样，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张春桥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姚文元任第一副主任，王洪文排在姚文元之后，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第三把手”。王秀珍是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一。也是上海市唯一的女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她从一个普通的工长，一下子当上了上海市的领导人之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跃升。跃升后的王秀珍阔了起来，她也坐上了小汽车，

配上了秘书，她家住的房子自然也换成了宽大的楼房了。

1968年底，中央筹备召开党的九大。在酝酿九大代表人选时，王洪文和王秀珍都列入九大代表之列。王秀珍当上了九大代表，这是她过去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更让王秀珍想不到的是，在九大上，她竟然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是她的又一次跃升。她不再是局限于上海市的领导干部了，她可以参与中央的一些重大决策的讨论了，这使她在高兴之余，也助长了野心。她认为，当上了中央委员，预示着她今后有可能跨进中央。

准备武装叛乱

但王秀珍想得太美了一点。九大以后，中央在筹备新的妇联组织时，没有考虑她，在成立中央各部委时，也没有考虑她，在上海，她仍然是排在后面的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显然，中央并没有考虑她进北京工作的问题，也没有考虑让她在上海掌握更大权力的问题。这使王秀珍的头脑稍微清醒了一些。她意识到，自己能够跃升高位，实际上全是靠造反起家，是靠“造反英雄”王洪文的提拔，是靠张春桥等人的赏识。要想保持住自己的地位，并且能有进一步上升的机会，就必须继续紧跟王洪文。

1972年9月，王洪文被调到北京去工作，参与筹备党的十大，这使王秀珍十分高兴。这件事也证明了王秀珍的判断——王洪文会步步高升的，自己今后紧跟王洪文，就有飞黄腾达的一天。果然，党的十大上，王洪文当上了中央副主席，这使王秀珍分外高兴。她除了跟王洪文跟得更紧之外，还开始做起吹捧王洪文、为王洪文树碑立传的工作来。她到上海市定海路，把王洪文发迹之前住过的房子列为“保护文物”。她到国棉十七厂，把王洪文当厂保卫干事时的办公室和办公桌也保护起来，作为纪念物品。她还组织人编写王洪文在上海造反的大事记，题为《上棉十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其中记述了王洪文的许多“事迹”，对王洪文百般歌颂。王秀珍还嫌不够，她还多次组织一些人到她一手搞起来的王洪文“圣地”去参观。

正由于王秀珍效忠王洪文，当1976年毛泽东病重，王洪文策划在上海

搞第二武装时，王秀珍成了积极执行者。

其实，王洪文早就有搞第二武装的打算。他在没有到中央工作之前，就在上海建立了一支有十万人参加，不听上海警备区指挥，而只听他指挥的上海民兵武装。王洪文进北京工作后，就把上海民兵的具体工作交给了王秀珍，王秀珍也十分卖力地替王洪文抓第二武装。1974年3月，王秀珍到北京，专门向王洪文汇报了上海民兵情况。王洪文对她说：上海民兵是我和张春桥搞起来的，是新生事物，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有战斗力的，你们要抓好。今后打仗要靠这支队伍，军队有问题，路线不端正，是靠不住的。对王洪文的这些话，王秀珍心领神会，当面向王洪文表示：保证抓好上海的民兵工作。回上海后，王秀珍按王洪文的“指示”，把上海工会中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的小兄弟，安排到上海民兵指挥岗位上，加紧了上海民兵的控制。1975年，王洪文受到了毛泽东的冷落，当年9月，他回上海搞所谓的“调查研究”时，在锦江饭店专门和王秀珍谈起搞上海第二武装的问题。王洪文说：上海民兵是经过斗争的，今后还是有斗争的……人家一巴掌打过来，看我们是否站得住。上海这个地方要立足于自己。要自己造炮。此后，王秀珍就按王洪文的指示，组织上海一些工厂造起火炮来。1976年天安门广场事件之后，王洪文感到北京的民兵不行，立即给上海的王秀珍打电话说：上海的民兵一定要抓紧训练，提高应急能力，不能像北京的民兵那样！一定要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王秀珍听到王洪文的这个指示后，当天就召开上海民兵指挥部会议，传达王洪文关于上海民兵工作的“指示”。王秀珍还组织上海民兵指挥部搞了代号为“反击”的三套作战方案，以解放军包围和进攻上海为假想。为了在思想上控制民兵，王秀珍还组织人编写了《民兵宣传手册》每个民兵发一本，在这个手册上规定，上海“民兵的主攻方向是革党内走资派的命”，上海民兵要“把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民兵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不停顿地战斗。”这个手册还说：“要随时准备粉碎他们（指“走资派”——笔者注）的武装叛乱。”王秀珍还



发挥出了她的组织力和“创造性”，在上海搞了一支摩托化民兵武装。在这支武装力量的成立大会上，王秀珍发表讲话说：“现在形势复杂，我们要有出现反复的思想准备，无非是杀头坐牢，杀了头不过碗大的疤。我们要豁出命来干，不能做投降派，不当叛徒，要干到底！部队靠不住，要准备打仗，内战外战一起打。”王秀珍还煽动说：“今后，谁搞修正主义就造谁的反！”1976年夏季，毛泽东病重，中央向各地党委通报了情况后，王秀珍开始按王洪文的指示，在上海给民兵突击发枪。先发了五十多万支枪，接着又给上海民兵装备了重武器，在上海共装备了10个民兵高炮师，185个高机连，3个地炮师等。王秀珍还不辞辛苦，每天都去民兵指挥部检查落实情况。

王秀珍紧跟王洪文，也就成了王洪文在上海准备搞武装叛乱的爪牙。

被中央稳住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王秀珍也加紧了在上海搞第二武装的工作。就在王秀珍积极准备在上海搞武装叛乱时，她没有想到，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四人帮”被抓时，在上海的王秀珍不知道这一情况，她还在做着紧跟王洪文，今后王洪文上台当中央主席后，自己平步青云的美梦。

华国锋在抓捕了“四人帮”后，预见到上海不会平静，搞不好会出现叛乱。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华国锋决定运用策略，稳住上海。而稳住上海局势，最关键的是稳住两个人物，一个是王秀珍，一个是马天水。因为“四人

帮”在北京，在上海为他们“看家”的主要人物就是这二人。华国锋决定，采取把他们调到北京来，然后加以控制的办法，先调谁来？华国锋过去就对上海这帮人有过分析，他考虑，王秀珍为人机敏，十分警觉，如果先调王秀珍来，她可能警觉起来，在上海先搞起叛乱来。于是华国锋决定先调马天水来。马天水去北京后，王秀珍等心里忐忑不安。因为一般有开会，张春桥都会事前通报。马天水去北京前，王秀珍叮嘱马去北京后打电话。

然而马天水去北京后却没了音信，王秀珍坐卧不宁，她通过种种迹象判断：北京出事了。于是立即准备武装叛乱。华国锋很快就知道了上海方面的情况。他决定进一步采取策略，稳住上海。他做了马天水的工作，让他给上海方面打电话，报“平安”。马天水同意了。10月9日，马天水直接给王秀珍打电话，告诉她：“我在京西宾馆，一切都好。”王秀珍急切地问：“四位首长（指‘四人帮’）好吗？”马天水答道：“他们都好，身体很好。”王秀珍问：“你见到他们了吗？”马天水答：“他们工作都很忙，我没敢打扰他们。他们在电话里托我向景贤和你问好！”马天水在电话中，语气沉稳，没有任何惊慌的迹象。王秀珍一下子把心放下了。她放下电话，立即把这个消息分别告诉“四人帮”在上海的“小兄弟”们。

9日下午，马天水又一次给王秀珍打来电话，告诉她，中央办公厅通知：徐景贤、王秀珍明天去北京开会。接到这个电话后，王秀珍又狐疑起来。一方面，她从各种途径得知，“四人帮”好象出了事，另一方面，她又从马天水的电话中得知，“四人帮”很好，还问她好。她有些犹豫，去还是不去北京开会。但是，既然是中央通知，就不能不去。临行前，她交待上海市“四人帮”的小兄弟：“我们如果三天没有电话，你们就决一死战。”带着满脑子的狐疑，王秀珍上了飞机。坐在飞机上，王秀珍心中做好了一去不回的准备。

但是，王秀珍和徐景

贤一到北京，就被中央稳住了。按照中央的要求，王秀珍给上海方面打电话说：“家里怎么办，等一两天我们回去再说。”在中央的要求下，她也不得不扮演马天水的角色。

1976年10月11日，外电报道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上海方面立即像开了锅一样。但是，马天水被调到北京，被中央稳住了，王秀珍、徐景贤也被调到北京，被中央稳住了，上海群龙无首，乱不起来，再也搞不起武装行动了。

13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到上海。就在这一天，华国锋派出的中央工作组先一步飞到上海，控制住了上海局势。马、徐、王三人见大势已去，只好服从中央决定。他们带着中央打招呼会议的材料、关于批判“四人帮”的材料，无精打采地下了飞机。当天下午，上海市委就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开常委扩大会，传达中央精神。事先，这个会场，已经被上海警备区派的警卫控制。马、徐、王三人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情况和批“四人帮”的文件精神后，要求与会人员，不通也得通，要闹也不准闹，还要表态拥护中央决定。王秀珍也不得不当场表态，拥护中央决定。10月24日，上海人民广场举行百万人参加的大会，庆祝华国锋任中央主席，庆祝粉碎“四人帮”。在这个会上，王秀珍没有发言，但她不得不随着大家鼓掌。中央鉴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能执行中央对他们的要求，为了稳定上海，在那几天里，仍然让他们的名字以上海市领导人的身份出现在新闻报道中，但实际上已经不让他们工作了。

10月27日，中央改组了上海市委，由苏振华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兼任的一切党政职务。不久，王秀珍和马天水、徐景贤等人一起被隔离审查。从此，王秀珍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四人帮”时，王秀珍曾出庭作证。这是人们最后一次在媒体上见到了王秀珍的身影。1982年8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王秀珍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王秀珍这个年纪很小时就当上了省一级人民代表和东北地区劳模的人，竟然走上了犯罪道路，得到了这样的下场。个中原由，不能不令人深思。■



受审时的王秀珍。